

第三章 汉传佛教的建寺文化

中国的佛寺

○胡人很努力并有目的至中土弘扬佛法

早期到中土努力宏扬佛教的都是西域的胡人，所以佛教还曾被称为「胡教」、「浮图教——胡图教」。西元二世纪中叶以后，贵霜内乱，有大批大月支人逃回中土，而源出月支的“羯”族石越政权（西元319-351年）虽“兼从本俗”，亦以“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更因听佛图澄之言兼崇佛教，故佛教开始盛行于北方各族之间。三国时代，五胡（匈奴、氏、羯、鲜卑、羌）内迁以后，胡汉通婚日久，后来胡人大部分融入“华夏族”，再也分不清楚其混血血缘的关系。

如大弘佛法的前秦苻坚是“氏”人，隋唐王室至少有一半的少数民族血统，唐太宗李世民之母、妻、媳均为“鲜卑”人，武则天亦有胡人血统。尤其因民情互异，加上如前秦苻坚（“氏”族，西元357-385年在位）、后凉吕光（“氏”族，西元386-399年在位）等等北方少数民族之胡人帝王的特殊考量，佛教的弘传难免有其适应性的调整。

中国对西域佛法的引入，首先还只是帝王的“御用宗教”（Court Buddhism），慢慢才为宫廷王族和贵族所供奉的佛教（Gentry Buddhism）。后来为了适应风土、民情、国情，常做有选择性的特意改写、编造佛经，最后成为民众膜拜的宗教（Popular Buddhism）。所以“汉传佛教”并非原始佛教，先是依附道术，与固有道术并重，才能被汉人接受，而且后来经杂有帝王「牧民」用意的选择与篡改，可知“印度佛教”传汉以后，部分得不到忠实的翻译，就有很大的程度上的异离了，使得后来同一部经有不少译本。

中国于西元第二世纪中、末期之后，随着贵霜译经僧与中亚及印度译经僧之来华，在各时代，尤其南北朝各胡人帝王，都有崇佛或采用“佛教政治”治国之现象。如北魏（Tuoba Wei拓跋魏，鲜卑族，西元386-534年）的“永宁寺”，隋文帝建各地的“大兴善寺”，武则天的“万象神宫”或“明堂”及各州的“大云寺”，北魏与北凉的造像石窟，都是沿袭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或「贵霜王朝」或犍陀罗的“大乘佛教政治传统”与护法信仰。

在浓厚的“儒教治国”的系统下，佛教文化能够涵盖其上，让帝王相信，进而推崇、护教，最后让「一个伟大的宗教征服了一个伟大的（中国）文化」而且渗透成为中印文化融合的现象，又能够保存至今，的确值得赞佩。

道安法师在《综理众经目录凉土异经录》中提到，河西一带有多部经典是中土所没有的，表示经典的翻译及流布，有其教化之选择性。因此，大陆学者季羡林教授也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先是依附黄老之学，再译经传教，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改变、渗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浸溶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

早期是王室（court）成员与中国的知识份子首先皈依佛教，此种“上层阶级”的佛教形成，总是由“士大夫僧人”（Gentleman-monks）在领导着。后来才推动了民间社会对佛教信仰的理解，才有“民众佛教”（Popular Buddhism）的兴起与发展。

因为任何一种宗教诞生、成长、落定于另一种族的土地上，必然要改头换面，才能适应新环境。“中亚佛教”在不断被逼质变，已呈现多样化，辗转移植到中国以后，“汉传佛教”信徒并不采用历史的资料去考证据称是佛陀教导的学说。常为了无数的矛盾无法解释，“汉传佛教”不得不编出一套独特的「解释学」，如「五时分教」、「八相成道」等说法，以免自相矛盾。而且也将中国固有的文化融入，形成特殊的“汉传佛教”文化。

后来许多大师为了解释各种「中国式」佛教与佛经，而十分苦闷，苦闷更加深了“汉传佛教”的思索性，而造就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哲学，后来发展出各大门派，各订不同的戒律与宗法，或创造新佛经如《佛说三世因果经》、《天地八阳神咒经》等等。但是许多产生在中国的后造经，又总是标榜在印度就已经有了，并且冠上「如是我闻」，以免丧失了权威和真理性。

○中土建寺的目的

从汉代到唐代有两种营造寺庙的途径，最多的是“施主”（Danapati，陀那钵底、檀那、檀越）营建后献出，其他的才是僧人自建的。世俗的建寺施主可分为官方和私家两类。“官方”营寺或为朝廷诏建，或是地方请建；“私家”营寺则是皇族、贵宦、官众，或地方上的耆望、商贾、处士、富农。其中皇家造寺是属于皇家的功德寺，以东晋、萧梁、隋、唐为盛，是由皇族与外戚发愿营建，常是为了立寺追福。“官方”营寺通常是皇帝以进行“弘教容僧”而下诏，由国家或地方官府出资营建。

不过，在北朝时，皇族以国寺为家寺，很少是捐施自营。士族家寺如西晋乌程的无为古寺，相传是“王衍舍宅”所建，可能是古时士族置功德寺的先声。曾有梁侍中何敬容（齐武帝长城公主驸马）被讥「又舍宅东为伽蓝，趋势者因助财构造，敬容并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饰，颇为宏丽，时轻薄者因呼为“众造寺”焉。」

当时拥有丰富钱财的王公贵族，便以为通过建造佛寺、布施财物、持斋供养等等途径，可以为自己祈福禳灾。

汉代至唐之间的“檀越”对「施愿建寺」、「功德转让」的信仰，大概有五种类型的心态：辟厄涤罪、福祚固宗、护产保业、憩隐放佚、皈依寄终。居于「辟厄涤罪」是为自己或亲人祈佑平安，为故世的长辈先人追福的，大多是皇亲、国戚和功臣阶层，以东晋、萧梁、杨隋、李唐最盛；对「福祚固宗」是祈求福佑皇朝、维固宗族的诉求，也宣示着对佛的感激和期盼。

如北魏文成帝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尊，以敬佛与享先合一；「护产保业」的原因是为了要保护田产家园不失，并且能够安全地传继给子孙，这是地主们最大的祈盼；「憩隐放佚」者，是标榜挥尘谈空的人生，发散高蹈出世的意绪，通常应该是隐士的理想；到了「皈依寄终」时，已经是一心供养三宝，把佛国当作心灵的最终寄托，也是精神最后的家园。

官方和私家营寺的主要目的，不出护国、护教、护法、护僧、护众、护境。当然平时或特定的日子会诵唱《仁王护国经》、《孔雀明王法》、《华严经》、《弥陀法门》、《药师法门》、《观音法门》、《瑜珈焰口》、《梁皇宝忏》等等，以求冥阳共沾法益。传到韩国、日本、越南、台湾等地以后，也都是如此。

晋唐佛寺大都位处优越地区，而且院落宽阔，房舍众多，生活设施便利。因此朝廷、官府、客旅每以佛寺为客居之所。有时作为战时顿兵之所，有时皇室在大寺安置宫眷，让将废皇后或先帝后妃、宫女入寺为尼。想上京考试的书生也借佛寺读书，或作为经商、停客之用，也无法避免。许多朝士更兼学坐禅，以为退身之计。如此多元之利用，想必人来人往，一片繁荣气象，佛寺于是变成为很重要的文化、经济、军事等利用的场所。

汉魏时代“只许胡僧立寺”，对佛寺曾加以禁限，后越中书著作郎王度之奏文提到：「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规。」

汉魏只许为西域僧立寺，当时的佛寺只为西域僧侣居住和宗教生活所使用，似有限制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也禁止汉人出家。而百官私自发愿造寺成风，后来又随着西域僧人的行止设寺，于是成为早期汉地佛寺发展的方式。北魏兴安元年（西元 452 年），文成帝下诏「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浮图一所」，这是中土依行政区普遍建佛寺的先声。

○中土古佛教建筑的情形

汉武帝好神仙方术，在宫中所修筑的观台阁榭，大多与神仙有关。故汉代宫观建筑与园林景观，多半杂有神仙思想，对佛寺影响极深《洛阳伽蓝记》另记载之「景林寺」、「大统寺」、「正始寺」、「河间寺」常有蓬莱仙馆之建筑。即写景林寺所谓：「海内作蓬莱山，山中有仙人馆，上有钓台殿，并作虹倪阁，乘虚往来」。

皇兴二年（西元 468 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在平城建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高峻），为天下第一”，为木构架的楼塔。约撰写于北朝东魏武定五年（西元 547 年）左右的《洛阳伽蓝记》一书，作者杨衒之于卷一云：「（西元 516 年，熙平元年，灵太后新造之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屠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三百多公尺，史上最高之塔）。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浮图（塔）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五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缣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松椿，扶疏拂檐；丛竹香草，布护阶墀。」

是以《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外国所献经像，皆在此寺，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之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型制似今之端明。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绮钱青锁，辉赫丽华。拱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装严焕炳，世所未闻。东西两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二重，北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绿水。」

北魏太和元年（西元 477 年），国都平城（今之大同）已有佛寺近百所，魏境佛寺达 6478 所。孝文帝元宏迁都以后，欲改变前期滥建之风，立《都城制》规定，洛阳城内建一（新）永宁寺，郭内建一尼寺，余寺悉建城郭之外。高三百余尺的永宁寺塔是在“减食禄官十分之一”下营造的。又下令外州造寺须「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所立」，让汉地佛寺在国家的干预下，有秩序地兴建。在佛教信仰的鼎盛时期，僧尼信众达到两百万之多。而有「天下第一名刹」之称的河南嵩山少林寺，是孝文帝为了安顿天竺来的高僧跋陀，于太和十九年下令建造的。但北魏后期却未能遏止滥建之风，北魏延昌初期（西元 512-515 年）全境佛寺有 13727 所；魏末增至三万余所；北齐增至四万余所。

「建中寺，普泰元年（西元 531 年），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阉官司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干明门，博敞弘丽，诸王莫及也。……建义元年（西元 528 年），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为（尔朱）荣追福，题以为寺。朱门黄阁，所谓仙居也。以前厅为佛

殿，后堂为讲室，金花宝盖，遍满其中。」

「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闾阖城门御道北，东去千秋门二里。千秋门内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即是魏文帝所筑者。台上有八角井，高祖于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洛州；台下有碧海曲池，台东有宣慈观，去地十丈，观东有灵芝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踊出，又似空中飞下。钓台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龙殿，殿前九龙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飞阁向灵芝往来。三伏之月，皇帝在灵台以避暑。有五层浮图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宁讲殿。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角之草，亦悉备焉。」

隋代终结了中国近三百年的战乱与分裂，一改北周武帝废佛之政策，开皇（西元 581 年）初，一度奉行「有僧行处，皆为立寺」的政策，“听认出家，……营造佛像”、“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原是北周大兴郡公的隋文帝杨坚，十三岁前，曾被比丘尼智仙抚养于今陕西大荔的冯翊般若尼寺，又被某高僧托说他是月光童子降生的，与佛教因缘深厚。登基时宣称：「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咐嘱。」即位后下令修复北周废寺，在“五岳及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

鉴于历代帝王崇佛与废佛的历史教训，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调和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统治政策，隋文帝在所经行四十五州建立“大兴国寺”，又在四十州各造宝塔供养舍利。仁寿元年（西元 601 年）以后，取法北魏，改行“按州立寺”的方针，计先后五十多州起舍利塔。道宣说隋文帝“道化天下，三分其二”，即指隋文帝时有三分之二的州建有佛寺。并以沙门彦琮为翻经馆大学士，后即命僧为官。展现了隋朝一统天下，以君权弘教的威德。至炀帝时，也曾大造佛寺，广度僧众，自称“菩萨弟子、皇帝总持”。但为时不久，即下令以僧定寺，强令无德僧尼还俗，而因僧废寺。

唐（Tang dynasty）初高祖李渊诏叙三教先后：「老教、孔教，此土之墓；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并没有出现如魏、齐、隋那样滥建佛寺的情形。唐太宗在原战场（交兵之处）建有七寺以立纪功业，如汜水的等慈寺，以灵塔、层阁为主体，辅以僧坊，绕以修廊，旁开禁苑、莲池，清幽宜人，是园林式的「祭寺」。贞观二十二年（西元 648 年），“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其时全国有 5358 州。高宗干封元年，封禅泰山，诏“天下诸州，各营一寺”，以示“推功大圣”，全国佛寺增至四千余所。

唐代载初元年（西元 689 年）七月，武则天应伪造的《大云经》所写“女主

当国”的假预言，“颁制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以示感戴，采取“举佛抑道”的措施；唐代中期佛教特别发达，唐玄宗开元盛世时，官方对佛寺设赐有定额，恪守“州别一寺”，故计应有 5358 座寺院，实际则建有僧寺 3225 座、尼寺 2122 座。

非额定之私寺，则称为“招提”或“兰若”，是不被政府认可较小的寺庙。开元二十六年（西元 738 年），唐玄宗自纪功德，敕“天下诸郡立开元寺”；会昌年间（西元 841-846 年），唐武宗禁佛，史称废天下佛寺四千六百所，“兰若”四万，检括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五百。以唐代人口约五千万人，供养五千余寺，二十余万僧尼，为经济能力之临界值，所以唐代设佛寺的定额，用以控制全国的佛寺规模，以免生产失衡，导致社会动荡。

《华严经》以毗卢遮那佛（Vairochana Buddha）为“法身佛”，“法身佛”本没有形象可见，中土则以卢舍那佛（Rocana Buddha）为其“报身佛”。《华严经》演化出千（叶）如来的思想，所谓「一叶一如来，一沙一世界」的观念，推及之皇帝象征如毗卢遮那佛，各州是千叶如来，百姓是百亿释迦。

建造大佛原是“大乘佛教”的特色，武则天与高宗则在龙门建奉先寺八十五公尺的毗卢遮那佛像，用以纪念唐太宗，可是却将自己的脸庞刻为佛面。后来大半数的韩、日两国的君王也效法起来，但都必须决定于君王对佛教的好恶与否。

大周垂拱元年（西元 685 年），武则天用薛怀义为“佛教政治”立国的要臣，如宋朝司马光后来在《资治通鉴》中写到：「毁干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使，凡役数万人，……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节气，亦为圆盖。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贯通，……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

道宣斥隋寺失度，是为“末世造寺”。道宣主张依循天竺舍卫城祇洹精舍的图样为范式，推出一幅标准多院式寺样——《戒坛图经》，足以显示当时京师大寺的构想，不难想象这种布局规制，很像在建造一座「大佛城」。此图显示为一所横连四院式佛寺，是以后殿为中轴线之中心，向前、左、右开展出来的建筑群。中为主院，由三条横廊将中院分隔为纵联四院式。在通过中院的中轴线上，依次建前佛殿、七重塔、后佛殿、三重楼、三重阁，形成主体组群。在三条横廊上和中院后廊内，依次有左右三重楼、左右五重楼和东西佛库，皆对称而立。中院左侧横联两院，右侧横联一院，三旁院内有各被廊墙分隔的五十余个小院，每小院中央各建一殿或亭。

唐代宗大历时，曾命僧道义依其所述在五台山之「幻见」，建造了金阁寺，此寺布局为纵列三院式：中院之山门是「楼阁式」，中院主体是三层佛阁，后有大食堂。与中院两廊连通的东院和西院，又各为“横联六院”。

唐文宗开成五年（西元 840 年），日僧圆仁到五台山，见山旁竹林寺有六院：律院、库院、花岩院、法花院、阁院、佛殿院，其布局应是以佛殿院、阁院前后纵列为中院，另四院两两纵列为东院和西院，合成为一座横联六院。五台山这两座寺，同为《戒坛图经》所主张的范式。而后世盛行之寺院布局，以中轴线对称之结构便已然形成。佛寺中院中轴线上的建筑群，有佛殿、重阁、讲堂、天厨，天厨之后，仓、库对称。中院周侧，则为僧伽院、臧获院、佣保舍、牛马舍等。

晚唐诗人杜牧（803-852）曾写〈江南春〉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北魏六朝时，王公贵人常捐舍王侯宅第改为佛寺，而园林景观，殿堂廊庑，大多沿承未改，中土之佛寺更将神仙思想融合于建筑中。隋唐之后，亦多承六朝（Six Dynastries），少有变革。至于今日，若未广览旅游等之其他资料，将会误认“汉传佛教”的建筑即是当时印度传来之建筑。甚至以为佛寺与氏宅、宫殿的一般布局视为“同构”，尤其各种经变图所显示的建筑，就是描绘汉魏隋唐时代的中国建筑样式，让人以为天上的宫殿就是如此。

五代十国时，北方佛教因政权更换频繁，佛教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南方各国相安，社会安定，帝王都热心佛教，所以南方佛教较为发展。历史上都将后周世宗归为灭佛的恶王，他在显德二年（西元 955 年）诏令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一律废除，出家须经过严格的读经试验。严厉禁止当时流行的烧身、炼指等眩惑惑世、割残肢体的行为，故史学家普遍认为他是在整顿颓废的佛教，而不是毁灭佛教。

宋代立国后，宋太宗曾自称“朕曩世尝亲佛座”，即给予佛教适当的保护，并设立「译经院」（后来改为「传法院」），又附设「印经院」。请来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施护等人翻译经典。从太宗太平七年到仁宗景佑二年的五十四年间，共译出梵本 1428 夹 564 卷，可见宋初朝廷对佛教的贡献极大。

可惜到宋徽宗时，改宗道教，强令佛号、僧尼之名号等都道教化，对佛教的打击甚重。宣和元年（公元 1119 年），宋徽宗受道士林灵素所惑，以“不废佛教，则为中国礼义之害”，乃改佛刹为宫观，称佛为「大觉金仙」，使服天尊之服，连带也使宋之「译经院」消失。并改称菩萨为「大士」、罗汉为「尊者」、和尚为「德士」、尼师为“女德”。又新立一「仙佛合宗」，致使后来造成佛、道不分，

佛教成为民俗信仰，变得华丽而庸俗。

北宋时汉地的佛教是以禅、教两家，加律宗后则为三类，禅宗仍为主流。而宋、元、明、清大部分的帝王，采取严格管理佛教的措施，其大概情形归纳如下：一. 不准随意私建佛寺；二. 不准随意剃度僧尼；三. 施行度牒考试制度；四. 限制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这些措施虽对佛教的快速发展有了限制，但仍有保护佛教的作用。

辽代之「耶律王朝」原是崇奉“萨满教”的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改幽州为燕京，佛教受到契丹贵族的重视，南京也成了整个辽代佛教发展的基地之一。辽代刻有的《契丹经》可能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大藏经》刻本，曾东传至高丽、日本。

金代与辽代之「耶律王朝」狂热崇佛有截然不同，金世宗对寺庙建筑屡作严格的限制，严禁民间建寺。大定十四年（西元 1174 年）诏谕：「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但经皇帝敕建，官府允许，仍可建寺，还可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朝廷的照顾与扶持。所以金代所建的大多是“官办寺院”，还兼作金朝皇帝的“行宫”。

○禅宗寺院与丛林制度

唐代禅宗（Chan、Zen school）兴盛，禅宗是中国的土产，但是并没有脱离「印度佛教」的脐带。禅僧起初本无定居处，大多穴居山林野外，有“山岩空谷间，坐禅而龛定”的需求。而后先是在律院中设“别院”习禅，南宗初兴则开辟丛林自立禅居，再发展而为「廊院式」的禅宗寺院。为了解中古以后的佛寺兴建情形，从禅寺的兴衰可看出现存诸古寺的特色，不如先由禅宗的“丛林制度”研究起。

禅僧穴居山林野地与天竺印僧苦行的生活相符，却难以适应中国不同之文化、环境。禅宗的自由意识与勇于改革的特性，即产生了一种新的形态，但并未忽视原始的佛律，而是以比较合适于中国的制度来安处徒众。如元代黄谱写的《天下师表阁记》说：「盖佛之道以达摩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备。他师所昌，殊宗异旨。虽各名其家，至于安处徒众，未有不取法于（百丈）禅师者。」

百丈·怀海禅师（亦称大智禅师，生平年为西元 720-814 年）立《禅门规式》，叙说禅寺发展的历程：「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系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定。……于是创意别立禅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号曰“长老”，……即处于“方丈”。同净名之室，非私寝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表

佛祖亲嘱授，当代为尊也。所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僧堂）设长连床、椀施架、挂褙、道具。」

从上可知禅宗初期的禅居仅设方丈室、法堂、僧堂，其唯树法堂不设佛殿及佛像，正是禅宗的本色。逝于西元 866 年的临济宗创始人曾说：「你若求佛，即被佛慑」，到了唐昭宗天复三年（西元 906 年），福州永泰县北山禅寺建成：亦无佛殿，但计方丈、法堂、禅房、客厅、香积、餐室，不下百数十楹，寺僧百余众，全永泰一大丛林也。

南宋开庆元年至景定三年间（西元 1259-1262 年），日本留学僧彻通义介其“遍游径山、天童诸禅刹，谒此间名纳，见闻图写丛林礼乐”，手绘有“五山十刹图”可看出当时禅寺兴建的制式：杭州灵隐寺寺前有溪涧，从山门依序沿中轴线布置佛殿、法堂、方丈室、禅堂，而“山门”之左为钟楼，之右为轮藏；宁波天童寺寺前有大池，从“三门”依序沿中轴线布置三世如来殿、法堂、掌光堂、大光明殿、方丈室，三门之左为钟楼，之右为观音阁。山或刹至此均指为佛寺之意。

这里所谓“轮藏殿”，就是转大经轮处，建有回转书架以收藏经文。《佛祖统记》记载：「梁傅大士，愍世人多故，不暇诵经及不识字，乃于双林道场，创“转轮藏”以奉经卷，其誓有曰：有登吾藏门者，生生不失身，有能信心推之一匝，则与读诵一大藏经，正等无异。」而今西藏人手转之小经轮，或许源自此典故。不过，有学者认为转轮藏是伪托由傅大士所创，但自从转藏轮发明之后，经教的神圣性于焉产生，少有人深入经藏，智慧之海已然人渺。

宋代朝廷注重“五山十刹”的设置，是根据卫王史弥远的奏议。宋宁宗时代（西元 1195-1224 年间），在嘉定元年（西元 1208 年）由朝廷赐立南宋所辖十五座著名禅寺称“五山十刹”，逐渐建立起一种经济依赖关系，并凭借佛殿所塑立的佛像，来威慑禅僧的信仰，其作用也达到控制禅僧的目的。《金陵梵刹志》有关〈重修瓦官寺厘记〉说：「百丈瓶立道场，不立佛像以为卓识。及见宋元之季，宗师上讲堂必先拈香而颂佛祝圣，心窃以为疑。」

浙江临安径山寺是南宋时期禅宗“五山十刹”之首，其平面比较简单，被当作中期禅宗寺院的范本，日本后来以径山寺为建寺制度，目前日本仍保存仿径山寺的寺院。如建于西元 1249 年的建长寺，以大片围墙围绕寺院，围墙开有寺门，进入寺门就可见到山门，从山门依序沿中轴线布置佛殿、法堂、方丈室，山门与佛殿间左右均以回廊连通，梁思成曾说：「…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围绕回廊…」，即是当时的特色。寺门与山门间之两侧，右为厕所（西净），左是浴室（龙边），此与“虎边不怕臭”的民俗相符。《摩诃僧祇律》中也记有：「厕所不

得在东、在北，应在南、在西」之规定。

禅宗寺院自唐、宋以来亦如各宗有“伽蓝七堂”之称的布置方式，其殿堂名称为佛殿、法堂、禅堂、食堂、寝室、山门、厕屋或佛殿、法堂、僧堂、厨房、山门、西净、浴室。七堂的制度，在各宗稍有差异，则视地域、环境而互有增减，大寺除塔、佛殿、讲堂外，还有钟楼、鼓楼、戒堂等，配合教义需要各有不同。宋代以后净土宗对一般信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虽与禅寺原始精神相斥，但禅宗也不得不把信仰调整为“禅净双修”，重点转移到一心念佛上，因此拜佛的佛殿才成为禅寺的主要殿堂。明代时禅寺内就有了“念佛堂”，是延续了南宋“禅净合一”的结果。

“山门”是寺院的正门，本来是牌楼形的大门，为四柱三门的形式，门顶采用楼阁的形状，就成为三楼四柱，也仍然有三门，应该是将正门称为“三门”，但是习惯视为某某山之正门，后来便称为“山门”。但另有一说，即唐代三门实取“三解脱门”之意，有“空门、无相门、无作门”的含意，寺院中多设外（南）门、中门与内门三座门殿，“山门”却是讹传之说。

中国佛寺演进到后来山门内有天王殿，天王殿也有兼作三门或作寺院的二门，称为“山门殿”，具有护卫之意，即将尘俗秽土隔绝在外，山门之内为修行之净土。现在基隆市的十方大觉寺就是如此，而“藏传佛教”的大昭寺也设有四大天王（Guardians of the four Directions）殿。

所谓“左晨钟、右暮鼓”或许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语辞。钟、鼓楼通常是寺院报时、集众敲钟鼓而设的。钟楼原设在寺院的东北角（艮方），宋以后逐渐往前推到天王殿的东侧，但是到了明末才有与鼓楼相对的型制出现。唐段成式所写《寺塔记》也提到「寺之制度钟楼在东」，不过，元末以前与钟楼相对的是轮藏楼，不是鼓楼。明代却是轮藏殿与观音阁对峙于佛殿两侧之间，后来鼓楼的出现并非为了取代轮藏殿，但最终是因为轮藏楼与观音阁建筑的消失，在清初即不再见有“左观音、右轮藏”的建筑出现。

“法堂”就是讲堂，为宣讲佛法、皈依、集会的场所。《六祖坛经》中慧能说：「我今说法，犹如雨溥润大地。汝等佛性，譬如种子，迁兹沾洽，悉能发生。」《百丈清规》制：「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表佛祖亲嘱受，当代为尊也。」法堂即是提供“慧”的最佳场所，也是禅寺的中心，设有师子座，供演说佛法之用。东晋时寺院内就设有法堂，隋唐以后各宗都将法堂视为仅次于大雄宝殿的主要场所。可是宋明以后，禅、教、讲寺制度融合，逐渐忽视了法堂，而专视佛殿为唯一重要场所。可惜，辉煌的佛殿逐渐出现，禅道生命则逐渐雕零枯竭。而佛殿职能的活动，更因法堂职能的减弱而增强，禅宗也不得不示弱了。

早期「禅堂」是禅僧坐禅、休息用的场所，禅堂还兼作「斋堂」，却容易混淆，违背了“空”的禅环境观念。丛林制度发达以后，斋堂分离出禅堂，形成专供静虑的禅堂在西、饮食的斋堂在东的定制，而睡眠则另提供了「僧堂」。禅寺有“左（东）厨房、右（西）僧堂”的约定安排。

禅宗以心传心的教法重视嫡传，对祖师塔与祖堂非常的重视，对于“付法、传法”的方式，从禅宗出分五支以后，自然有其神秘感，尊师的伦理也如儒家般沿袭下来。宋白云守端说：「天下丛林之兴，大智禅师力也。祖堂当设达摩初祖之像于中，大智禅师像西向，开山尊宿东向，得其宜也。不当止设开山尊宿，而略其祖宗尔。」而天竺佛教绝无称呼师叔、师伯之事，但有了祖师堂后，已无法避免如此俗世之称谓。伽蓝堂供奉的是护法神或土地，所谓「左伽蓝、右祖师」是指宋朝时在法堂两侧的配置方式，与中土“左社右祖”的信仰相同。可是祖师堂与伽蓝堂在明清时则分列于佛殿之旁，显然法堂的地位已不如佛殿。

元代的帝王虽然奉佛，但是却特别地崇“教”抑“禅”，是特别热衷于修功德、做佛事。举凡法会，念经、祈祷、印经、斋僧、修建佛寺，所有费用大多由国库支付。忽必烈的太子出生后，就由海云“摩顶而立”，用以显示王权的正统性；太子登基前，都受有“沙门戒”；累朝皇帝均“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元文宗帝图帖睦尔时（西元 1328-1333 年在位），因《禅门规式》已经历代增删损益，出现不少杂本，僧尼无所适从，即敕命百丈山大智寿圣禅寺住持德辉重新修定，定名为《百丈清规》，对寺院僧团的上下组织体制、宗教活动、日常生活等，都有所规定。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深知僧事，即位后采行严格管理、恩威并重，曾亲定僧人必修之经为：《心经》、《金刚经》、《楞伽经》三部。更直接干预佛教，“洪武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礼部照得佛寺之设立化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见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本月二十一日本部官钦奉”、“洪武二十四年，……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理当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为寺……。”

同年又颁布《申明佛教榜册》言：「其禅者，务遵本宗公案，观心目形以证善果；讲者，务遵释迦四十九年秋妙音之演，以导愚昧；若瑜伽者，亦于见佛刹处，率众熟演显密之教，应供……」，如此三令五申，显见禅寺型制已有定案。

洪武十六年（西元 1383 年），杭州府学授徐一夔“奉敕撰灵谷寺碑”写道：

「以十四年九月之吉，中作大殿，殿之东为大悲（殿），殿之西为经藏（殿）。食堂在东，库院附焉，禅堂在西，方丈近焉。而大殿之后则为“演法堂”……。而其为制以佛之当独尊也，故于正殿则奉去、现、未来之像，其他侍卫神不与焉。以禅与食不可混于一也，故食堂附于库院。以师不可远其徒也，故方丈近于禅堂。以联坐观心或涵于笑语而弗专做故异其龛，以单寮息力或流于宴安而弗检故同台室……。此皆皇上万机之暇虑思所及……。赐额灵谷禅寺，又赐田若干亩以饭其众。」可惜禅宗到明代已成末式。

明代寺院之兴建亦盛，曾多次刊印《大藏经》颁赠天下寺院，是希望通过经教能提高僧众的水准。明永乐二十二年（西元 1389 年），僧人姚广孝撰《天界寺毗卢阁碑》道：「毗卢阁，…上供法报化三佛及设万佛之像。左右度以大藏诸经，法阇后延观音大士…。」又明孝宗弘治十八年（西元 1505 年，岁次乙丑），《重修天界寺记略》言：「其毗卢阁永乐中所建，迨今弘治甲子，久而将颓……，大藏经置于其中，既将大雄、三圣、观音、轮藏、伽蓝、祖师等殿缀茸球珠，规制悉易观焉。」

记略指出虽有轮藏殿，却将《大藏经》藏放在毗卢阁内，而毗卢阁亦位于中轴线上，并与佛像同位，其于天界禅寺尊经之意甚明，也显示寺方对皇帝所赐与经藏的重视。明代从世宗废佛之后，佛教盛况大减，佛教开始脱离对朝廷的依附，而有独力发展的驱势，到明末终于高僧辈出，呈现短暂复兴的现象。当然这里指的是佛法的兴旺，而不是佛教建筑的兴旺。

清王朝亦曾刊刻佛藏而企图引导、控制佛教，雍正还亲自编辑禅学语录与《当今法会》诸书，以控制佛学。而寺院已将藏经阁置于中轴线的最末位，而不是在旁侧，此与轮藏楼消失不再建，以及僧众对御颁佛藏要特别尊重，颇有关系。少林寺内亦有明弘治年间所建的毗卢阁，于乾隆八年（西元 1743 年）曾奉旨颁《大藏经》贮藏在内，并定名为“藏经阁”。而《净慈寺志》记载：「毗卢阁，康熙二十八年（西元 1689 年）住持方孝建，乾隆五年改为藏经阁，上供钦赐龙藏。」

康熙年间重建灵隐寺时，在大殿前之左右分建东、西戒堂，有碑文记言：「殿之东为东戒堂，之西为西戒堂，法堂之东为东禅堂，之西为西禅堂。……古无戒堂而今有戒堂，……栖者众戒为禅本…」，此由戒导向禅的意义，在当时影响很大。

清代禅寺与诸宗合一，太虚禅师在《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一文中说：「清中叶以后，各寺不以禅法反以寺庙产业为主。故其开戒说法的目的，反而成了继承寺产的接待人了。……禅寺混合成内则禅讲律净，外则经忏齐焰，即禅讲律净以究真，经忏齐焰以应俗。天童寺齐备之。」本来寺前设放生池是天台宗的主张，

清代则因诸宗合一的结果，连禅寺前也设有放生池。后来如北平智化寺，虽直属临济禅宗，在近代调查出寺中已无禅堂存在。连苏州的开元禅寺亦无禅堂之设。明清两代净土宗的念佛法门独兴，有着强烈的世俗需求，禅寺仿佛已经不存，未能再现“唐宋之风”。

如今的禅寺与百丈禅师所制定以禅堂为主并重法堂的情形，相去甚远。如嵩山少林寺，寺内尚存初祖庵与达摩洞。寺院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方丈室与毗卢殿，这种布局是依明代禅院布置的；福建广化寺是清代依旧制兴建的。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并对称设置钟楼、鼓楼、禅房、方丈室、客房、膳室等；宁波天童寺是禅宗大寺，沿中轴线设置天王殿、佛殿、法堂，法堂之上为藏经楼，法堂之后的西侧设罗汉堂，佛殿内供奉三世佛与十八罗汉；湖北黄梅五祖寺是弘忍禅师所制，沿中轴线设置天王殿、大佛殿、毗卢殿（麻城殿）、真身殿等，毗卢殿前所设配殿分别为圣母殿、千佛殿，另有方丈室、禅堂、寮房、客堂、戒堂等，另曾有天王殿但已毁；北京房山的云居寺也是大型禅院，沿中轴线设置山门、天王殿、毗卢殿、大雄宝殿、药师殿、弥陀殿与大悲殿等六进殿宇，另配有之钟楼、鼓楼、僧寮多已毁。

中国古代的宫殿、衙署、佛寺、住宅均采“四合院式”的布局，是一种封闭性最强的建筑空间，不过有了宽大的庭院，则变化灵活，提供了不少适应性。中古遗留下来的寺址、碑记、文志，都可提供后代的我们，明白中国佛寺兴建的历史与文化。以象征佛教宇宙观所建立的佛塔寺，曾出现在天竺或藏地（如桑耶寺）。

虽然中国古代对“天极”的象征，建造有“极庙”、“明堂——合宫”等建筑「以祀上帝，接万灵，布政教焉」，将建筑物同宇宙的原型结合在一起。但是在“汉传佛教”尽是模仿诸天净土，极力铺陈寺庙的华丽，鼓吹方便简易的佛国净土修行，并未于其建筑上表现出宇宙的象征。禅宗诃祖骂佛后，更无暇顾及宇宙的象征。如今台湾信众的“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信念，也是战后的特色。原来民间对佛教信仰的需求一直在转变，寺院的布置也随着在变。有帝王的干预，也有乱世的渴求，这就是“汉传佛教”文化的特色。

附录：禅宗之五山十刹

禅宗五山：

1. 杭州（临安府）径山兴圣万寿寺（径山寺），创于唐天宝初年（西元 742 年）。

2. 杭州（临安府）北山景德灵隐寺（云林寺），东晋咸和元年（西元 326 年）建，宋景德四年（西元 1007 年）改称景德灵隐禅寺。
 3. 杭州（临安府武林县）南山净慈报恩光孝寺（净慈寺），五代后周显德元年（西元 954 年）建，南宋绍兴九年（西元 1139 年）改称净慈报恩光孝禅寺。
 4. 宁波（明州府）太白山天童景德寺（天童寺），原创于晋永康十年（西元 300 年）于义兴，唐至德二年（西元 757 年）移至今址，明洪武十五年（西元 1382 年）重定等级时，改列为禅宗五山之第二。
 5. 宁波（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寺（育王寺），创于南朝宋元嘉二年（西元 425 年），宋大中祥符元年（西元 1008 年）改为禅寺。
- 后元文宗（西元年 1328-1332 年在位）时，建金陵之天界大龙翔集庆寺独为五山之冠，明朝依之。

禅宗十刹（十院）：

1. 杭州（临安府）中天竺山天宁万寿永祚寺（法净寺）。
2. 浙江吴兴（湖州府乌程县）道场山护圣万寿寺。
3. 南京（建康上元府）蒋山太平兴国寺（灵谷寺）。
4. 苏州（平江府）万寿山报恩光孝寺（万孝寺）。
5. 浙江（庆元府）奉化雪窦山资圣寺（雪窦寺）。
6. 浙江（温州）永嘉江心山龙翔寺（江心寺）。
7. 福建（福州府侯官县）闽侯雪峰山崇圣寺。
8. 浙江金华义乌云黄山宝林寺。（双林寺）
9. 苏州（平江府）虎丘山云岩寺。
10. 浙江天台山国清教忠寺（国清寺）。

○佛寺建筑的材料

中国古代的建筑材料以砖材、木料为多，通常木材作为主要结构材，再砌以砖墙，上盖屋瓦，即可遮避风雨。而基础、墙基、柱头处也有石材为之，纯以石材建造的，只有少数的小佛塔或祖塔。

建于辽统和二年（西元 984 年），位于今天津市蓟县的独乐寺观音阁，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木结构高层楼阁。也是建于西元 1056 年，辽道宗清宁年代，在今山西应县的佛宫寺仍有纯木造的木塔，总高 67.13 公尺，其八角形平面底层直径 30 公尺，是全世界现存最早、最高大的木结构式建筑。

现知中国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是五台山（Mt. Wutai）的南禅寺大殿，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西元 782 年），因系为禅寺，朴素无华，没有天花板的藻饰，

也没有壁画，直接出现眼前的就是柱、梁、桁、椽；同样位于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重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西元 857 年），是中国现存第二早的木建筑。

纯以砖瓦建造的佛殿，有五台山显通寺的无梁殿及峨眉山万年寺无柱无梁的砖殿；五台山显通寺内另有以纯铜铸造的铜殿。

○悬空寺——在危崖建筑的空中佛寺

中国现存有三座悬空寺，即河北沧岩山悬空寺、云南西山悬空寺、山西恒（衡）山悬空寺。其中以山西恒山悬空寺规模最大、最壮观。其奇妙处以「三步一廊，五步一楼，七步一龕，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悬崖，勾心斗角」来形容最为贴切。

恒山悬空寺位于山西浑源县城南三、五公里的恒山金龙口西崖翠屏山之峭壁上。此寺始建于北魏后期（西元 471-532 年），以后历代均为重建，是中国地区罕见的高空木构造建筑群。架筑在半山腰的悬空寺，因河床淤积，位置最低的殿堂约距水面 26 公尺，最高的三教殿距谷底 58 公尺，形成一组错落有秩的建筑群。寺内有四十余间楼阁，安排大殿、经阁、配殿与僧舍等建筑，其中的大殿、经阁、钟楼、鼓楼、碑亭都是重楼，配殿又建在经阁之上。

明代王湛初有诗赞称：「谁凿高山石，凌虚构梵宫，蜃楼疑海上，鸟道设云中。」当地民谣曰：「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不难想象此寺“险中求稳”的险峻之美。

悬空寺整座建筑群面对恒山，背西向东，上载危崖，下临深渊，背崖凿龕，穿洞插梁，完全依照力学原理，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为一体，廊栏左右紧连，错落有秩，迂回相连，形成特殊的框架结构，增强了抗震的能力。悬空寺半藏于绝壁之中，突出的岩石减缓了山风的吹袭。恒山的主峰阻挡了阳光，使得每日的日照年平均时数仅有二小时。日照、雨水、风侵对其无损，所以能保存一千四百多年。

悬空寺原是纯佛教寺庙，于金世宗大定十六年至十八年（西元 1176-1178 年）的维修之后，成为“三教合一”的殿堂，现存建筑四十多间，有朝殿、会仙府、碧辂宫、纯阳宫、楼台亭、寝宫、梳妆楼、御碑亭等，分散在山腰、崖边与坡道上。明代御史郑洛作〈过悬空寺〉诗云：

「石壁何年结梵宫，悬崖细路小溪通。
山川缭绕苍冥外，殿宇参差碧落中。」

残月淡烟窥色相，疏风幽籁动空禅。
停车欲向山僧问，安得山僧是远公。

昨过招提故不登，重寻兰若问山僧。
峰顶青鸟来还否，洞口白云去未曾。
谁结丹梯高万丈，我闻佛法演三乘。
恁虚顿悟心无住，好步禅关最上层。」

○福州鼓山涌泉寺——台湾佛教的祖庭

台湾人的原乡可说是福建、广东一带，而台湾佛教的祖庭就是鼓山涌泉寺。本世纪初叶，台僧的传承绝大部分传至自鼓山涌泉寺，此寺与台湾佛教的因缘浓厚，所以有特别介绍的必要。

鼓山位于福州的东南郊区，鼓山是大顶峰、白云峰、狮子峰、钵盂峰、卓锡峰、石伞峰的总称，诸峰共有一百六十多景，山中奇石竞秀林立，层峦耸立风光秀丽。涌泉寺就座落在如此风景绝佳的游览胜地，初建于唐建中四年（西元783年）有华严寺，宋时曾赐下禅院匾额，近千年来历经唐代会昌法难、明代祝融之灾与飓风吹损，清顺治初年（西元1644-1646年）由僧元贤重修，康熙敕赐有亲书之“涌泉寺”匾额，乾隆及光绪年间曾重修。

涌泉寺是福建五大丛林之一，傍倚白云峰，前临香炉峰，占地二十五亩，主体建筑是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宝殿，两旁偏殿三十余座，依山形而上，气势磅礴。天王殿前有二座“千佛陶塔”，是北宋神宗元丰五年（西元1082年）的文物，东为“庄严劫千佛宝塔”、西为“贤劫千佛宝塔”，双塔均是八角九层，高七公尺，塔基为石砌平台，塔身为仿木构造楼阁，上贴佛像一千又三十八尊，八角塔檐另有塑有僧人、武士像七十二尊，并悬挂陶钟七十二个，塔座上塑莲瓣、舞狮、侏儒，并有铭文刻记塑造年月。

建于顺治十六年（西元1659年）的藏经殿，又于康熙年间重修保存至今，殿内藏有《大藏经》二万多册及血书。藏经殿后有念佛堂、客堂、大悲楼、大寮、库房、斋堂、祖堂、印经楼、禅堂、学戒堂、方丈室。文革期间寺中元、明版的善本书有二千多册被烧毁，明代的佛经刻版也多遭焚毁，损失惨重。

西元1988年由妙湛法师晋山以后，涌泉寺已步入正轨。山中胜迹无数，泉水潺潺，岩壁题记甚多，值得一访。

○小结

中国的佛寺太多，无法在本章一一述明。近两千年来，为了佛教建筑，已投入无以算计的人力、财力。不管真正的目的地是否已达到了拯救人心、启发佛性的效果，佛教建筑毕竟是延续中华文化数千年来的场所，应该值得珍惜。可是，如今中国大陆的佛寺大多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国民旅游观光的景点，并且发售门票，收入或许能维护建筑物不让继续老旧破损，却不足于“维修复旧”。

在中国接近城市的佛寺，自古就形成参观、旅游的景点，甚至是聚餐饮酒、闲话品茶、观灯赏月、避暑纳凉、观戏购物的好去处。佛法已变得不很重要，修行沦为一种形式而已。

如今开放后被列为观光的佛寺，在其寺内或附近亦开设有餐厅及饭店，供应荤食酒菜，成为一处处生意场所，看不到僧众与佛法传教。饭店的招客传单就写道：「夜幕低垂时，清风当空舞，明月松前照，邀三五知己把酒宴欢，人生夫复何求。还犹豫什么？快来吧，千年古寺正在张开它的双臂热情地拥抱来自远方的客人！」，不禁令人叹息，仿佛是“末法”的景象。希望有识之士看完本书后，对“汉传佛教”的未来应有所思考、有所助益。

中国的石窟群

位于中国的「四大石窟」是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已在上一章提及，下面提到的是中国境内主要的石窟群：

大同云岗石窟

云岗石窟（Yungang caves）是中国四大石窟群之一，已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云岗石窟为中原地区大规模的开凿石窟，以山西大同市（Datung）之西、武州山之南的云冈石窟为最早。其中以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西元460年）开始，五年间所建立的“昙曜五窟”为最著名。拓跋鲜卑

族帝王所下令开凿的石窟，虽然是犍陀罗的“粉本”，但是仍带有希腊、波斯的影响。以过去帝对释迦佛，现在帝对弥勒如来，面像采「以帝为师」、「皇帝即如来」、「帝身为佛身」的雕塑。

由此可知在文成帝时，弥勒信仰已被帝王利用来抬高地位、维护统治的工具。它没有明清时代的俗丽，仍呈现着原始的粗犷魅力，令人激赏。孝文帝于太和十年（西元 494 年）迁都洛阳，开始服制的改革，群臣亦改易汉服，此种南朝士大夫褒衣博带的常服，也让后来所雕的佛像服装汉化了。

蒙古地区的传说，是北魏俘虏了一百多万汉人，带到新都平城（大同附近），令俘虏们把崎岖的山区脊变成了奇异的石窟和雕塑的画廊，这是否真实不去管它，但是显示云岗石窟的工程浩大，是可以理解的。

云岗石窟临十里河，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大大小小的窟龕约 252 个，现存主要洞窟有 53 个，造像五万一千余尊，与莫高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三大佛窟艺术。北魏太和时，酈道元在《水经注》灑水条：「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渔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灵岩，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流出山。」可见当时该地有山有水，景色壮观。进年来又进行过大规模的整理和建设，环境变得更加优雅。

云岗 20 号窟是露天的大佛，高 13.7 公尺，结跏趺坐，双手作禅定印，显得雄伟肃穆。该窟原有前壁，辽代以前已经崩塌，造像完全露天。它的前面一片平川，视野开阔，在阳光下很远就可见到它雄伟的影像。其凿刻的手法仍带有犍陀罗的艺术风格，佛像神态庄严静穆，让人肃然起敬。

像身的贴体袈裟衣纹是采用直平阶梯式的刻法，细部刻以阴线纹，头光与身光的外缘为火焰状，络腋上的连珠纹，则是波斯萨珊王朝时常用的装饰纹。这尊是汉传佛教最早的佛像作品之一，而有学者认为「武州（云岗）造像，必源出凉州」，非直接接受犍陀罗的艺术风格。

云岗 16 号主尊立佛高 13.5 公尺，高肉髻，旋涡波浪状的发型，广颡大耳。身着厚重毯披，右手上举胸前，左手作手印；云岗 17 号是弥勒菩萨交脚坐像，高 15.6 公尺。弥勒菩萨头戴宝冠，右袒披肩，交脚约有 4 公尺；云岗 18 号为高 15.5 公尺的立佛，左右有二菩萨。

天水麦积山石窟

天水麦积山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群之一，位于甘肃天水市东南 45 公里的麦积山，是西秦岭山脉西端小陇山中的一座孤峰，有如一座状似巨大「麦垛」的孤山，周围山林奇郁，野花幽香，松溪映带，环境宜人，为“秦地林泉之冠”。石窟就开凿在山体的西南、南和东南三侧的垂直峭壁上。

石窟于八十公尺高的悬崖峭壁上，上下有十余层的栈道相通，层层相迭，上下错落，密如蜂窝，为中国仅见的一座洞窟悬空的石窟寺。史籍称：「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龕千窟，虽自人力，疑是神功。」此奇绝之境可想而知。

山顶有一座隋代的古塔，高 9.4 公尺。麦积山石窟始建于西元 402 年，东晋元兴元年（另说是在公元 380 年，后秦时期就开始开凿），北魏天兴五年，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十余个朝代，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修增，其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交融，成为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胜地。约在公元 734 年，唐开元二十二年，天水一代受到强烈地震，而使窟群分为东、西崖两部分。

麦积山石窟是世界上唯一以泥塑和石胎泥塑为主要内容的大型石窟，采用“以形写神”和“形神兼备”的手法，展现高超的中外传统艺术的完美结合。麦积山石窟现存大小窟龕一百九十四个，东崖五十四个，西崖一百四十个，保留有各种艺术造像七千八百余尊，古代壁画一千三百多平方公尺，有“东方雕塑馆”之称。

另外，石窟还藏有青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玉器、古雕版、古文书、书画等二千多件文物。其中北魏的造像有一部分是薄衣透体的佛像和菩萨像的塑造，呈现偏袒右肩、衣裙贴体、凹线衣褶的工法，可以见到健美的体魄；鲜卑族北周的佛陀造像多作低平肉髻，薄发无纹，圆脸短颈，衣着贴身，是“曹衣出水”的工法。有高仅 60 公分的小坐佛像，双手抚于胸前，面露微笑，甚为传神，表现高度的艺术妙境。

在高七十多公尺的散花楼上七佛阁上端，有北周时代的七幅飞天壁画，每幅有四尊伎乐飞天，衣服、飘带、乐器等都是彩绘，唯有脸与手足是薄薄的浮雕，呈现雕绘混合的整体美。最别致的是雕出多层变化的佛龕像，其雕工之精美不可多见。

如有一龕，其中心雕出释迦牟尼佛和弥勒并坐的造像碑，楣上层雕有七佛小龕，龕下布满璎珞，下垂锦绣天幕。竟然是由坚硬的石料刻出轻盈柔软的织品，像绸缎又似丝绒，居然还有织品的光泽。另外更显得夸张的巧思，是将长裙因坐势而下垂簇集成美丽的弧线，使整个造像形成雕刻、绘画与图案的混合物，是不

输于欧洲的。

其他如东崖摩崖大像，是麦积山石窟的标志，有十六公尺高的释迦牟尼佛像，还有千佛廊、踏牛天王等值得一览的洞窟。中国大陆有关部门正加紧进行申报为自然文化双重「世界遗产」的前期准备工作，将详尽收集麦积山周围地形、地貌、地质状况、水文状况及温度、湿度状况的测绘资料和科研报告，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

洛阳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Longmen caves）也有北魏时代的风格，也是中国四大石窟群之一。位在洛阳市（Luoyang）之南 12 公里伊河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山崖上，南北长一公里。现有洞窟 1352 个，佛龕 785 个，佛塔 39 座，造像 97,306 尊，题记和碑碣 3,680 块。北朝与唐代所凿的窟龕占百分之九十。石窟大多利用天然溶洞稍加扩展而成，窟形简单，平面多呈马蹄形，个别的呈方形，窟顶也是略加雕饰的平顶，一反敦煌、云岗石窟的中心柱窟、覆斗式天花和洞口柱廊的建法。

龙门石窟主要有古阳洞（Guyang cave）、宾阳洞（Binyang cave）、莲花洞、火烧洞、石窟寺等。宾阳洞是开凿时间最早、最精心富丽的石窟，其中第三层有两幅大型的历史画卷式浮雕〈帝后礼佛图〉，在 30 年代被盗走，现藏于美国纽约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博物馆。

唐代所开凿的奉先寺（Fengxian-si）卢舍那大佛，为唐代雄踞峰顶的代表作，完成于上元二年（西元 675 年）。此尊大佛高 17.4 公尺，头部高 4 公尺，耳朵就长 1.9 公尺，虽然双手及腿部有损，但仍具磅礴雄伟的气势。两侧为天王、力士、弟子及菩萨。

可是，佛像的面容秀丽丰满圆润，一双秀目微微凝视，高直的鼻下是女性慈祥的微笑。据说是武则天的脸部翻版，武则天以薛怀义等着《大云经疏》中之「女子承正，威服天下」的记载，她自视为佛，俨然以大日如来的报身君临天下，所以就开凿此像。

在龙门石窟的造像已逐渐脱离西域的风格，而独自发展出中国的特色，此特色后来影响及韩、日两国，成为汉传佛教的一个系统。佛像的温雅敦厚，其气质已无胡人的粗犷，是东方民族的代表性创作。

天龙山石窟

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在太原市西南 40 公里处，原名方山因汉族北齐（Northern Qi dynasty）在此建有天龙寺，所以改称天龙山。现有二十一个洞窟及其它小窟，分布于东西两峰，其中东峰有 8 窟，西峰有 13 窟。从东魏、北齐以来仍有龙门石窟的余绪，直到唐朝才因“曹衣出水”的流行，而显出其特色。

石窟其中于北齐天保年间（西元 550-559 年）开凿的石刻，都有十分写实的建筑形式表现出来。第一、十、十六窟窟前皆有三间窟檐，柱子为八角形，比例瘦长，柱根是覆莲柱基，柱上托大斗，斗上横施阑额，斗拱为一斗三升式，拱身卷杀，补间是人字拱，都是北朝的建筑特色。

天龙山的唐雕身躯裸露、体格丰腴，筋肉表现柔软富有弹性，体态优美，也给人艳丽的印象。有所谓“曹衣出水”的画法，系北齐画家曹仲达创造的一种人物线描法。《图画见闻集》记说：「其体稠迭，而衣服紧窄」指出衣服贴身，似被水湿过一般，固称为曹衣出水。天龙山石窟有不少刻画精美的菩萨头部像流落在国外，现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盛唐时代菩萨头部像，其发髻高束，面部丰腴柔和，弯眉细眼，樱桃小口，肌肤细腻富有弹性，是极为精美杰作。

炳灵寺石窟

甘肃炳灵寺石窟位于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区永靖县城西南 35 公里处，开凿在积石山黄河右岸的大寺沟内。炳灵寺是取藏语“仙巴炳灵”之“炳灵”两音，原意为“十万（弥勒）佛洲”，是明清时此地建有喇嘛庙后的命名，所以藏族同胞一直视此地是自己的寺院，有那样的亲切感。为唐代叫龙兴寺，当时所开凿的石窟，其塑像也是强调健康丰腴的美感，但也有其特点：脸形较长，颐丰唇厚，颈腰胯往往作明显的转折，动态比较夸张。雕刻刀法不像天龙山、龙门那般细腻，显得有点粗犷劲力。菩萨的造型则是十分的世俗化，超过其他石窟。

炳灵寺石窟现有窟龕 183 个，石刻造像 694 尊，泥塑像 82 尊，壁画 900 平方公尺，大型摩崖石刻 4 座。以第 169 窟西秦时的作品最古朴、敦厚。该窟北壁是其精粹所在，主要造像完成于永康、建弘年间（西元 412-428 年）。佛造像身后背光，绘有各种伎乐天，身上飘带、披巾萦绕，有种飘飞之美。伎乐天形象与外缘的联珠纹及火焰纹，构成了和谐的图案。如此佛雕像与周围壁画结合的表现方法，是中国石窟雕像的一大特点，也呈现了五胡十六国时代西北地区的社会风貌，舞蹈、音乐与装饰艺术，给今人最佳的参考价值。

唐代的造像与北魏时期有很大的区别，人物相貌不再是“秀骨清像”，有地方淳厚拙朴的特点，面型丰润，下颌嘴角深陷，双唇丰厚，神情自然写实。而菩萨之造型具女性化，体态一波三折，优美妩媚。

○韩国（南韩与朝鲜）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韩国（Korea，高丽，Koryo 的转音）处于中、日之间的“朝鲜半岛”，西元 1953 年因战争而分为两个国家，一是“北韩”（North Korea），领土面积有 120,538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 2,334.8 万人；一是“南韩”（South Korea），领土面积有 99,274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 4,610.9 万人。

据传说在尧帝时，帝释桓因的儿子下凡，与熊女生下檀君王，开始治理朝鲜，为「檀君朝鲜」时代，但因属上古时代，故不足为信。可是北韩的国家主席金日成，居然在西元 1993 年，宣称在平壤附近发现檀君的遗骨，为了只是对南韩显示优越些；商朝时代朝鲜的北方就有远夷肃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Chosen，由「朝日鲜明之地」之意而来；或认为朝是东方，鲜是鲜卑族人之意。），始有君王；秦始皇统一天下，降服自称是箕子后代的箕否，亦隶属于「秦朝」。

西元前五至二世纪，朝鲜半岛上散布着许多部落，北部是被中国统治的。汉高祖十二年（西元前 195 年），燕人卫满率兵千余名流亡朝鲜，消灭当时的「箕氏王朝」，成立「卫氏王朝」。汉武帝即位后，扩充疆土，出兵灭了卫满的孙子右渠，将今日北韩地区的朝鲜部分纳入汉朝版图，分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汉人流行的阴阳、五行、图讖、术数、风水、卜筮、神仙等信仰也开始流行于朝鲜半岛。

古朝鲜大率为汉江以北之地称之，汉江以南古称“辰国”。西元前 37 年，汉元帝建昭二年，“弁韩”建立的「高句丽王朝」（Koguryo Empire）诞生，四世纪初叶，曾将北方的中国入侵者赶出朝鲜半岛。在同一时期，西南部的“马韩”建立百济和东南部的“辰韩”建立新罗势力增强，后来成为韩国的三国（Sanguk）时代，历史上称为「三韩」。

东晋义熙九年（西元 413 年），高句丽第二十长寿王阴谋百济（Paekche），以求间谍。时有沙门道淋，应募入百济，以棋见盖鹵王，甚为亲昵。道淋劝王大兴土木，以致仓廩虚竭，人民穷困，国运日危。齐永明八年（西元 490 年），仁圣天皇三年，道淋还告之长寿王，王乃以兵三万攻百济，围主都汉城，纵火焚城门。盖鹵王出宫西走，为高丽人所杀，时为长寿王六十三年。

新罗国名之确定时，是在梁武帝天监二年（西元 503 年），智证王四年，因群臣奏曰：「始祖以来，国名未定，或称“斯罗”，或称“斯卢”，或言“新罗”，臣等以为，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义，则其为国号宜夷。」由是定名“新罗”（Silla），时当梁天监二年，武烈天皇五年，可见当时韩国仍以中文

为官方文字。

在隋朝以前，高丽句国的领地还达辽东半岛以及长春一带，到了七世纪中叶，新罗和唐朝联袂征服了“百济”（于西元 660 年）和“高句丽”（于西元 668 年），终于在唐高宗咸亨三年初（西元 672 年），新罗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因为从唐朝传入了许多文化，统一的新罗时代曾发出闪亮的光芒。为了巩固王权的策略，新罗也大举佛事，完成了纪念统一大业的四天王寺、感恩寺、甘山寺、望德寺等等佛教建筑。可惜八世纪之后，又再度成三分局面，称为后三国时代。后来由高句丽统一，于梁末帝贞明四年（西元 918 年）时，建立「高丽王朝」，此后高丽维持了 475 年的安定。

佛教建寺弘传的开始

佛教初传高句丽王朝和百济王朝，均顺利获得王室的支持。晋简文帝咸安二年（西元 372 年），氐族人称帝于关中的前秦苻坚派特使及沙门顺道，持经卷、佛像赠送给北边的高句丽国第十七代君主小兽林王，是佛教传入韩国（Korea）之始。越二年，东晋僧阿道又去高句丽，高句丽王在首都辑安附近的丸都城建了省门寺（肖门寺）由顺道住持，同时也建了伊弗兰寺由阿道住持，这是朝鲜半岛佛寺建筑之始。

佛教传入朝鲜半岛西南的百济稍晚于高句丽。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西元 384 年），枕流王元年，梵僧摩罗难陀由东晋渡海到百济的汉山城，受到百济王的热诚接待，诸王“以土木为神像，率百官祭之”，且“穿金以建珥堂，凿玉以立宝塔”，翌年创佛寺于汉山，并度僧十人。此后“僧尼寺塔甚多”佛教在百济泰安丰岛的瑞山和唐津西海岸建有泰安摩崖伽蓝、云山摩崖伽蓝、百济金刚佛伽蓝和修德寺等等。

四世纪时的百济和日本的「飞鸟王朝」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日本的文化受到百济的首都“扶余文化”（Buyeo）影响很深。而百济圣明王迁都泗城后的「扶余时期」（西元 538-660 年）是百济佛教最兴盛的时期，虽然“飞鸟文化”的母体就是由百济发展成长的，可是日本的佛教是在西元 552 年，梁元帝承圣元年，当时佛教已经在百济生根了一百六十八年后，才因百济的圣明王劝进，而“公传”入日本，后来也移民七千零五十三户人口进入日本。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位于朝鲜半岛东南的新罗，是在纳祇王时（西元 417-418 年）由高句丽传入的，这指的是「新罗王朝」正式支持佛教的开始，其实新罗佛教早先想由民间扩展，却一再受到原始萨满教（Shamanic）习俗的排斥，因此曾经多次的殉教后，才获得王室的承认。法兴王十五年（西元 528 年），佛教经由

官方同意传入新罗自梁朝正式认可佛教。梁武帝太清三年（西元 549 年），梁武帝遣使沈珙并新罗学僧觉德送佛之舍利至新罗，新罗真兴王奉迎于京城之兴轮寺。兴轮寺是一座九层高的塔寺，从此新罗佛教便趋向旺盛。

南朝时陈文帝陈蒨热心佛教的传播，于天嘉六年（西元 565 年），遣使刘思及留学僧明观送佛教经论 2700 余卷，让新罗的经籍臻于完备。我们发现南北朝时期约一百五十年间，新罗有很多著名的高僧到中国和印度求法，有玄光、明观、无相、圆光、智明、安含、慈藏等人。圆光在陈末隋初来华求法，回国后大事宣传佛教的“三皈五戒”，居然为了当时的争战国情需要，将五戒改为：「一、事君以忠；二、事亲以孝；三、交友有信；四、临战无退；五、杀生有择。」完全迎合君王的需要，居于护国主义故意做与中、印佛教不同的解释。

而当时被称为韩国「八宗之祖」的元晓，为了调和百家之争，提倡“皈一心源说”以图调和争异，并对中国的各种教理进行科判，甚至讥笑天台智者大师的“五时八教”说是以「以螺酌海，用管窥天」。

韩国历代帝王都相信弘传佛教，会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能够庇护众生，远离灾祸、瘟疫、疾病，使“北传佛教”在朝鲜半岛得到很好的沃土，但是以走入为“祈福佛教”。十世纪初，原是新罗王朝弓裔王（自称为弥勒佛、Miruk-bosal）的摩下大臣王建被拥戴为王，建立「高丽王朝」，四百余年历代诸王都是笃信佛教，热衷于佛事。高丽太祖以“护法者”自居，即位后即大兴佛寺，后来在《宋史·高丽传》有所谓“王城有佛寺七十区也”，可见当时佛寺之盛观。太祖更礼待僧侣，开办法会，使佛教隆盛异常，临终时遗言强调要护持佛法。后来王室成员竞相出家，甚至朝廷规定多子家庭必须送一子出家，推动了崇佛的高潮。

“高丽时代”则从宋朝吸取中国文化和制度，努力于改革。可惜，后来因为外有北方民族的入侵和倭寇的骚扰，内有官吏和僧侣的腐败，源自「高丽王朝」长久奉佛，大兴寺塔和名目众多的佛事活动，却只徒具形式，耗费国库定也劳民伤财，加重人民的负担，儒生因之起而反对。终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西元 1392 年），高丽王被其武臣李成桂所灭，「李朝」太祖统一全国，并改国名为朝鲜，开始了五百多年的李氏“朝鲜王朝”，历史上通称为「李朝」。

李朝历代君王大都不支持佛教，甚至限制佛教、排斥佛教。朝鲜时代特定儒教为国教，太宗继位后实行尊儒抑佛的措施，进行淘汰僧侣，限制寺院奴婢的数量，并且削减寺刹的总数等。佛教因此式微，但是佛教仍旧是当时平民的精神信仰。世宗时废除僧录司制度，强将诸宗并为禅、教两宗。文宗时禁止百姓出家，规定僧尼不得进入都城，僧侣只能栖隐在山林中，这也就是韩国佛教学者所称的“山僧时代的佛教”时期。

十九世纪倭寇入侵，僧侣曾组义僧军反抗，大量以身殉国，爱国的表现使得朝廷改变对僧人的看法，在光武元年(公元 1897 年)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同时也解除僧尼不得进城的禁令，佛教终于有了新兴的机会。可惜西元年 1910 年朝鲜被并吞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次年日本总督颁布寺刹令，将朝鲜佛教分为 30 个本山，凡是住持、文物、字画等等的处理，都要经过总督的批准，对朝鲜佛教做完全的控制，直到公元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可是紧接着却爆发历时三年的韩战，而朝鲜分裂成南北对峙的两个国家。

韩国佛教以华严宗为最大宗派

新罗统一时代到高丽时代，正是中国盛世，唐朝的建筑、文学、美术、雕刻等文化直接移入，新罗是融合了高句丽和百济文化，并积极接受大唐文化的传递，所以唐韩的佛教是相互呼应的，当时也是韩国佛教最兴盛的时代，许多佛寺和佛像都是在此时兴建的。韩国的“五教九山”也形成于当时，它们是：

一、“涅槃宗”：主要依据《涅槃经》经义所建立的。由新罗武烈王时期（西元 654-660 年，时当唐高宗永徽、景庆年间）的普德和尚开创的。“涅槃宗”有八大伽蓝，根本道场是景福寺。对《涅槃经》研究有成就的是元晓、义湘、憬兴、义寂、大贤，还有普德和尚高足无上、金趣等人。

二、“律宗”：由善得女王时代（西元 632-646 年在位，时当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慈藏创建于梁州通度寺（在庆尚南道梁山郡灵鹫山），曾设“金刚戒坛”施戒。慈藏于西元 636 年率弟子僧实等入唐，在终南山云际寺学南山律，回国后任大僧统，在芬皇寺（其址并塔现存庆州）开讲《菩萨戒本》，修订并整顿了朝鲜的僧尼戒律。

三、“华严宗”：以传承中国华严宗系统的义湘大师属“浮石宗”，在此时期开始有组织地发扬“新罗华严宗”，在他领导影响所及的寺院，以浮石寺、毗摩罗寺、海印寺、普愿寺、玉泉寺、美理寺、梵鱼寺、华严寺最有名。此系统的寺院，其大部分都没有塔，或有塔也建在与主殿（金堂—无量寿殿）无关的位置。既然是弘传华严宗，应该以毗卢遮那佛为主尊，但是义湘大师却在浮石寺的金堂以阿弥陀佛替代毗卢遮那佛，而奉为主尊。“华严宗”另一派是元晓独自创立的“海东宗”，以阐扬元晓的《华严经疏》、《大乘起信论》为宗旨，以《十门和净论》调和百家的争论。

四、“法相宗”：由真表律师于八世纪中叶在金山寺创建。承玄奘—圆测—道证—憬兴—大贤的法统，传印度唯识宗安慧系的学说。憬兴作有《成唯识论易记》、《瑜伽论疏》，顺憬作《成唯识论易料简》等，使新罗“法相宗”奠定很好的基础。

五、“法性宗”：以弘扬《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宗旨，阐述诸法实性之义。此三论思想始自晋朝入高句丽的顺道、阿道及高句丽僧昙始传播的。

另外有明朗建立的「神印宗」传杂部密法；惠通建立的「总持宗」传唐朝善无畏的印诀，以后更有明晓、惠日、慧超等人传金刚智、不空的密法。

直至八世纪末，创建海印寺（西元 802 年创建）的顺应大师与利贞大师到唐朝，跟随神琳大师的弟子学到唐本新的《八十华严》与贞元本《四十华严》，返国后的新学僧，便将主尊改回为毗卢遮那佛像（中土称卢舍那，卢遮那，流舍那，是法身佛毗卢遮那 Vairocana 的报身）当然也与唐朝密宗尊重毗卢遮那佛有关。早期新罗的佛教是具有思辨，为贵族所信的“教学佛教”。

到九世纪初，重实践的禅宗在新罗兴起，后来成为各朝佛教的主要力量。但是民间也开始流行称念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信仰、观音（Guanyin）菩萨、地藏菩萨和弥勒如来的净土的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新罗王族金乔觉，于出家后在唐玄宗时渡海至安徽九华山，苦行修练，募化建寺，广弘教法，使九华山成为地藏菩萨显灵的著名道场。新罗还有一类“祈福佛教”是结合佛教的功德报应和道教的阴阳五行及地理风水的思想，使佛教深入一般民间，也增加了神秘性。（很像今天的台湾民间佛教信仰）

高丽时代佛教最大的宗派仍以“华严宗”为主。在均如大师（西元 923-937 年）、义天大师（西元 1055-1101 年）主导下，高丽华严宗不但继承了新罗华严宗系的寺院，并在开京创建本山兴王寺以及法王寺、开泰寺等寺院。高丽佛教多以讲究顿悟修行，效法高僧举止为主，并不重视佛像的膜拜。

高丽高宗十九年，蒙古士兵侵入，虽然焚毁几十年才刻成的《高丽大藏经》的雕板。但在四年后的西元 1236 年，又倾尽国力重新雕刻，经十五年才再次刻成，雕板至今仍存在海印寺内。蒙古入侵时，又曾带入密教，佛像的制作有过短暂的复苏现象，大多以塑造、木刻及金铜铸造为主。后来因为铸造技术的退化与材料的短缺，佛像呈现衰退的图像化。

朝鲜时代的「李氏王朝」太祖李成桂曾受到高丽王朝崇佛的影响，对佛教采取扶植的政策，封僧人为国师，在宫中斋僧，举办法事，雕刻经板，并兴建佛寺。可是继位的太宗采以强烈的“兴儒排佛”，并制定佛教宗团的统废合法。此时原是华严宗系的浮石寺、海印寺、梵鱼寺、华严寺等，骨子里还是维持华严宗寺院的特性，但金堂已改成大寂光殿或觉皇殿。

如早期的海印寺、华严寺等寺院，供奉三身佛像（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卢舍那佛，化身释迦牟尼佛），若金堂太小则仅供奉毗卢遮那佛一尊。但在朝鲜时代的大寺院则形成了一种复合式的安排，将大寂光殿和毗卢殿建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在大寂光殿里也供奉三身佛像。

汉城（Seoul、Soul）唯一的佛寺是曹溪寺（Jogesa，刹、寺同音，其寺名发音均同闽南音），建于西元 1935 年，内有大韩佛教的“曹溪宗”总务处，成为现代韩国佛教的大本营。据说寺内有中国的梵钟，此梵钟本来放置在日本东本愿寺别院，后来才搬到此地，惜今未能再见。韩国国内只有几棵白松，曹溪寺内曾有一棵树龄超过五百年的白松，因此十分珍贵，但也未再见。

雪岳山（Seolaksan）国家公园的雪岳洞附近有一座新罗时期的古刹神兴寺（Sinheungsa），由慈藏法师于西元 653 年（新罗第二十八代真德女王时期）所建，原名为香城寺，文武王时改名为禅定寺，但毁于朝鲜时代的战火，直到西元 1644 年再度重建，并命名为神兴寺。当时有一座奉祀佛陀舍利的九层石塔，目前因破损只剩下五层。寺中普济楼内有距今 1400 年的大梵钟，和一千多年前慈藏法师亲刻的佛像。

从神兴寺往北走约三公里的继祖庵（Gejoem）是同时代所建的寺院。过去有东山、觉知、凤顶三位祖师在此修道，之后为义湘、元晓继承，由于其后更有杰出僧侣辈出，而得到继祖庵之美名。

位于忠清南道修德车站以西 15 公里，有一座百济末期所建的古刹修德寺（Sudeoksa）。寺中的大雄宝殿则建于高丽末期（西元 1308 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是韩国最古老最好的木造建筑。修德寺是模仿典型的高丽寺院样式而建，架构非常卓越，殿内的壁画亦十分完美。

忠清南道首府大田市附近，有一座建于百济时代（西元 724 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的东鹤寺，这座古寺现在是韩国最大的尼僧学院。

东鹤寺以西鸡龙山西麓的老松和山毛榉森林中，有一座 1500 年历史的古刹甲寺（Kapsa）。寺内有大雄宝殿、千佛殿、佛塔等十余处建筑，并且保存有铁幢竿、月印释谱版本佛经等珍贵的遗产。

忠清南道有七十多座寺院，而新罗时代所建的巨大古刹麻谷寺（Magoksa），是这些寺院的总寺庙。麻谷寺位于公州西北方 26 公里的茂盛山溪谷中，有「春麻谷秋甲寺」的美誉。麻谷寺曾受到喇嘛教的影响，寺中于高丽末期所建的五层

石塔，形式就比较特异，十分珍贵。灵山殿安奉着千佛像，也常令旅客诧异。

佛教传到新罗后 24 年（西元 533 年），梁武帝中大通五年义信祖师从天竺携回佛教经典，而建立了著名的法住寺（Beobjusa）。法住寺是韩国五大寺院之一，但是在壬辰之乱时几乎全被焚毁，现在所见的是仿原形新建的，是听来历史久远，建筑物看来却颇新的缘故。法住寺的大雄宝殿与无量寺（Muryangsa）、华严寺（Whaeomsa）的大殿并称为韩国的三大佛殿。殿内的三尊佛像高 6 公尺，周围 6.6 公尺，是韩国最大的佛像。

汉城南方 250 公里的全罗北道道厅所在地全州（Jeonju）西南 30 公里的母岳山西麓，有一座新罗时代（西元 766 年，唐代宗永泰二年）兴建的名刹金山寺（Keumsansa）。寺中弥勒殿内的弥勒未来佛（Maitreya Bodhisattva）立像，高 11.8 公尺，是韩国最高大的塑像，弥勒殿因此也并列为国宝。

庆州（Kyeongju）是新罗国时代的千年古都，也是南韩最古老的都市。位在庆尚北道的南端，距釜山市（Pusan）以北 65 公里处，现在是韩国中东部的名胜地。庆州更是韩国人的心灵故乡，每一个韩国人一生中未到庆州，会觉得很遗憾，所以有句话说：「不到庆州，不知新罗，等于没有到韩国。」

庆州的历史悠久，是韩国古迹文物遗留最丰富的地方，韩国人称庆州是「没有围墙的文化博物馆」。庆州周边区域有密集的王陵古墓外，还有海印寺通度寺（佛宝寺）、（法宝寺）、松广寺（僧宝寺）、佛国寺、皇福寺、石窟庵、断石山神仙寺，以及南山一带的摩崖佛像等等，有着无数的佛教文化遗迹，还保存着许多文化财产，可想象庆州一带更是新罗时期的佛国净土。

位在庆州市东南的佛国寺（Bulguksa）座落在吐含山上，建于新罗二十三代法兴王的时代（西元 535 年，梁大同元年），是为了母后的发愿而建的（另说是宰相金大成为今生父母所建），并附建了人工挖掘出来的石窟庵。千余年来经过数度修建，可惜在上世纪的韩战期间不幸毁于战火，战后才又重建，如今共拥有七座僧堂，据说规模仅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仍然号称是全韩国第一大且最精致的建筑。因此，佛国寺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及文化遗产。

佛国寺最先彻底的被破坏是于“壬辰之乱”（西元 1592 年）时期，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时，烧毁大部分建筑，除石造物之外，全被焚毁。而在「李朝」正祖（西元 1725-1776 年，时当清雍正、乾隆年间）时代再度重建，目前留存者计有无说殿、观音殿、毗卢殿以及多宝塔和释迦塔。佛国寺的多宝塔高 10.4 公尺，是纯白花岗岩石塔，于新罗景德王时代建造。多宝塔外观好似木造的，其优雅细致的程度少见，是新罗艺术的代表，属于国宝级的文化财产；释迦塔有三层，高

8.2 公尺，为韩国典型的三层石塔，没有任何装饰和雕刻，又名无影塔（Muyeongtap），也是国宝级的文化财产；大雄殿左旁的极乐殿和毗卢殿，安置了国宝级的阿弥陀如来（高 1.66 公尺）和毗卢遮那佛（高 1.77 公尺）的座像，两座都是以金铜制成，手法洗练，造形优美，是统一新罗时代留存至今的国宝。在佛国寺里仿佛将法华世界、极乐世界、莲华藏世界共组成一个新罗的佛国净土。

距佛国寺约 3 公里的吐含山东侧山腰，有号称「东亚三大石窟」的石窟庵（Seokkulam），据说是宰相金大成为追念前生父母而建的。它本是石佛寺的附属设施，由人工开凿，窟内分为前室、通道、窟室。窟室圆形天花板下安置了高 3.43 公尺的释迦牟尼佛降魔坐像，莲花座是圆形的座台，以纯白花岗岩雕刻而成。佛像的手印、坐向、大小等，与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所详述的释迦佛成道处菩提迦耶大觉寺的佛像一模一样。佛像庄重肃穆，有唐朝的风范，是韩国雕刻艺术中的杰作，更是韩国的国宝。石窟两侧有金刚力士及八部神将，孔武有力，威武雄猛。整座石窟地形险峻，朝东面海，是新罗人「依佛力攘敌」的镇国寺院，有抵挡倭寇侵袭，并具有保卫疆土的用意。

韩国第三大城大丘市（Daegu）在釜山以北 117 公里处，而伽耶山国家公园就在大丘附近。伽耶山南麓的海印寺（Haeinsa）创建于“新罗时代”哀庄王三年（西元 802 年，唐德宗贞元十八年），由顺应和利贞所兴建。它与通度寺（Tongdosa）、松广寺（Songkwangsa）并称为韩国三大名（主）寺。但是也有据说是高丽王朝高宗时代，想用佛力防犯蒙古的侵袭，以拯救高丽，因而建造海印寺。

雕刻印行佛经，通常被认为有消灾、祈福的妙处。韩国在高丽显宗时（1010-1031 年）为击退契丹的入侵，曾刻成《高丽旧藏经》，安奉于八公山符仁寺，后因蒙古入侵被全部烧毁。高宗时又在江华岛重刻，历经十六年完成，就是目前珍藏在海印寺的八万《高丽大藏经》经版；另建于宋仁宗庆历二年（西元 1042 年）的普贤寺，位于妙香山，风景秀丽，是朝鲜建筑的艺术代表作，内亦藏有《大藏经》八万册。

海印寺寺内现藏有的八万卷《高丽大藏经》，是宋理宗端平元年（西元 1236 年），高丽国王高宗因蒙古入侵，为祈求国泰民安，在江华岛禅原寺开始制作大藏经版，总共花了十六年的时间，将经文刻在 81,258 枚的白桦版本上，以此功德祈求收复国土。这批「八万高丽大藏经」是研究佛教经、律、论的重要文献，日本也以此为底本，制作了《神守大藏经》，并且在七年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佛教传到新罗之后不久，约在宋孝武帝孝建三年（西元 456 年），创建的直

直指寺，是南韩历史最悠久的佛寺之一。据说阿道和尚指着黄岳山（Whangaksan）说，总有一天，这个山麓一定会有寺院建立，而因此命名为直指寺。

韩国唯一的禅寺梵鱼寺（Beomeosa）和三大名寺之一的通度寺都位于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的附近。

梵鱼寺位于金井山山腰，是“新罗文武王时代”（西元 678 年，唐高宗仪凤三年）建立的，但于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时焚毁，重建于西元 1613 年，明万历四十一年。梵鱼寺有五百万平方公尺，原有 360 多座的佛殿、僧院和庵，所以曾为韩国四大寺院之一。

通度寺在釜山以北三十公里处，是为了「通达万法，普渡众生」的理念建寺而命名。唐贞观十九年（西元 645 年），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代，慈藏法师从唐朝携回佛陀舍利拿到此地，因而建寺供奉。通度寺在明万历二十九年（西元 1601 年），毁于壬辰之乱，如今的规模是重建于西元 1941 年。通度寺有全国最大的 T 字型大雄宝殿及大小僧舍 35 座，规模宏伟。此外，寺中尚保存有 1300 多年前慈藏法师的袈裟。

○日本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日本（Japan）群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方，南北狭长的群岛中，从南往北由四个大岛：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以及数千个小岛组成。领土面积有 377,727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为 12,628.1 万人。由于纬度相差十五度之多，因此气候相差明显，变化亦多。汉武帝曾动用武力扩充版图，在《汉书》〈东夷传〉记载：「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换以印信。」西元 1784 年，在南方博多湾的志贺岛，曾掘得「汉倭奴国王」金印一颗，足以证明。

如今的「日本佛教」已经变化成不同于中国传去的佛教，为了因应各个时代的需要，日本佛教一直在转变中。中国佛教徒甚至露骨地说：「日本佛教是歪曲了中国佛教而堕落的佛教。」日本自己的学者也认为：“确实非常大胆地脱离传统正轨，而看来有些许堕落”，纯然是应付岛国人民的期待使然。

南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西元 522 年），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南梁人司马达带一族归化日本，到大和国高市郡阪田原，结草堂供置佛像，礼拜甚恭，属

佛教「私传」日本之始，当时日本人尚视佛为“他国神”，佛教是为“蕃教”；成书于八世纪的《日本书记》说西元 552 年，南北朝梁元帝承圣元年，日本第二十九代钦明天皇十三年，佛教最初的「公传」传入日本，是百济国的圣明王（宋蒙王，穆永王之子）遣西部姬氏达率怒璃斯致契等上表劝进。

百济圣明王有感于佛法是「诸法中最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莫能知，此法能生无量福德，乃至成办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泊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最主要的是强调信仰教义最出色的佛教，便会「有求必应，所欠无缺」。）并进献金铜佛像、经论、幡盖等，除了法隆寺的国宝百济观音（Paekche Kannon）外，还有飞鸟寺（前身是法兴寺，后改称元兴寺）的遗迹佛像，及广隆寺的宝冠弥勒菩萨半跏思维像，完全是百济的特色。如是佛教便以最新文化的色彩被传入日本的。（另据奈良时代成书的《元兴寺伽兰缘起》则说佛教公传到日本是在西元 538 年。）

可知日本的佛教寺院最早建立于钦明天皇“飞鸟时代”，是为了安奉百济国献贡而来的释迦佛像，苏我稻目把向原氏的私宅改成寺院，称为向原寺，作为礼拜佛像并且祈愿的场所。可是在敏达天皇十四年（西元 585 年，岁次乙巳）以前，日本疫病再度流行（可能随百济传来的天花病），人民死亡甚众，天皇亦病逝。被保守派臣子怪罪是佛是“瘟神”，佛教给日本带来了灾难，因此佛寺佛像被毁，出家人被禁，日本古代佛教史称为“乙巳法难”。

隋文帝开皇六年（西元 586 年），日本用明天皇听大臣苏我马子主张奉佛，仿效大陆国家之支持佛教流行，但仍受大连物部守屋和中臣胜海（世掌祭祀，主张仍应奉敬 Kami 国神）的反对。次年，天皇逝，大臣苏我马子联合泊濑部皇子、竹田皇子、厩户皇子举兵杀物部氏等保守派，拥立可能会信佛的泊濑部皇子为崇峻天皇，可是崇峻天皇想摆脱苏我家族的控制，传曾搜集军备于宫中。却被苏我家族发觉，苏我家族再度展开攻击，杀掉崇峻天皇，拥立推古天皇（钦明天皇与其出身苏我家族的皇后所生得女儿）继位，从此苏我氏专擅朝政。

在讨伐战争困难时，厩户皇子为祈祷胜利，许愿建四天王寺。苏我马子也发誓说：「凡诸天王、大神王等助卫于我，使获利益，愿当奉为诸天与大神王，起立寺塔，流通三宝。」于是在崇峻天皇元年时，苏我氏请来朝鲜人，仿高句丽的清岩里废寺格局建飞鸟寺（即法兴寺，也称元兴寺，在今奈良高市郡日香町）。

而厩户皇子（用明天皇二子，死后谥号“圣德太子” Shotoku Taishi，后世还盛传他是南岳·慧思的转世。）果然在摄津建四天王寺，把物部氏的奴隶分出一半作为寺奴，分出其田宅作为寺的田庄。推古天皇继位之元年（西元 593 年），

圣德太子把四天王寺移建难波之荒陵。推古天皇二年，高句丽僧人惠慈、百济僧人慧聪来日，受到圣德太子的敬信，并从惠慈学习了二十年的佛法。

日本从担任推古天皇摄政王的圣德太子开始，便把大乘佛教置于治国、教民的指导地位，并且派“遣隋使”出国学习。从其所拟的「十七条宪法」中可见到提倡“笃敬三宝”的政策，而且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在当时特别流行。当时天皇及贵族通过造寺、塑像、颂经等向佛菩萨祈祷功德利益。日本建寺的动机及精神，诸如圣德太子所建的四天王寺或是圣武天皇所建的国分寺，无不是为了降伏佛敌或镇护国家为目的，也就是当作拥护国家的祈愿寺而建立的。

除了“国寺”，其他公卿百官等所建立的私寺，也都是为了自己祈愿成就而建立。日本佛教的兴盛，首推圣德太子的大力提倡。隋大业三年（西元607年），圣德太子派遣使者小野妹子到隋都，有沙门十余人随行。《隋书·东夷传》记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并沙门十人，来学佛法。」

又，具北魏式样的法隆寺又名“法隆学问寺”始建于推古十五年（西元623年），是圣德太子为了纪念用明天皇而兴建的。法隆寺曾于西元670年失火烧毁，其后再度重建，如今为日本现存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构造建筑群。寺中的百济观音风格不同于日本的佛像造型，据学者考证是由唐地传入，或邀请造像师亲至日本造的。寺内供奉祈求圣德太子夫妻及其母后冥福的释迦三尊像，还有金堂与五重塔，都是古物，值得一看。

日本一般把“推古天皇时代”称为“飞鸟时代”，而把“大化革新”至迁都奈良之间称为“白凤时代”。“大化革新”以后，逐渐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属“奈良时代”之前期（西元645-710年，时当唐太宗贞观至唐睿宗景云年间）的“白凤文化艺术”是受到初唐的影响，称为“唐样”（Tang rules）。

天武天皇十三年（西元685年），命各地每家设佛龕，置佛像、佛经供养。此时期造寺、造像最多，以奈良现存的药师寺东塔为最有名，是天武天皇为祈皇后病愈而建的。古旧的东塔为木造，现塔为重建，看起来是六层塔，其实只是三层而已，因为是每层各有堂阶，富有律动产生的感觉。药师寺中著名的「佛足石」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是遣唐使黄文本实从普光寺的佛足石临摹出模型，带回日本仿造的，以后日本才盛行制造佛足石。当时盛行讲经，常讲《金光明最胜王经》、《仁王般若经》、《维摩经》、《无量寿经》。

“奈良时代”的圣武天皇仿唐朝国家佛教的特色，也以佛教为国教，用来巩固政体。“奈良时代”的佛教有所谓的「南都六宗」，即“三论宗”、“法相宗”、“成实宗”、“俱舍宗”、“华严宗”和“律宗”。圣武天皇于天平十二年（西元740

年，唐开元二十八年）发愿，三年后开始和平城京（今之奈良 Nara）原金钟寺的地方建国家大寺——“大倭国分金光明寺”（总国分寺）——东大寺（Todaiji），高 47 公尺，面宽 70 余公尺，耗时十年才完成。

并且在各地方行政区设“国分寺”，有比丘住持的为「金光明四大天王护国之寺（国分僧寺）」；比丘尼住持的称「法华灭罪之寺（国分尼寺）」。规定寺院每月八日必应转读《金光明最胜王经》，以祈四大天王之拥护，能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每至月半诵戒羯磨。寺院经常得到来自天皇、政府和贵族的施舍，包括土地、封户、奴婢及财物等等。

初期国分寺的建造并不顺利，因为各地方政府在饥馑、疫病流行之后，财力不足，民力疲惫，进度缓慢。直到光仁天皇元年（西元 770 年，唐代宗大历五年），建寺的基本工作才告结束。实际上很多不是新建，而是旧寺再利用或改建。奈良时代有元明、圣武、孝谦三位天皇出家。所以，这古都一千多年来虽然因为战火的洗礼，如今仍保存有众多的寺庙与神社，充满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氛。目前所称奈良古都的「南都七大寺」即东大寺、西大寺、大安寺（南大寺）、元兴寺（极乐坊）、兴福寺、药师寺、法隆寺。

“国分寺”的建造都是渊源于中国，如元魏文成帝令诸州郡县各建一寺；隋文帝仁寿元年至四年，下令诸州建舍利塔 111 所，盛行法仪为皇帝、皇室和臣民忏罪祈福；唐高宗时命天下诸州置寺观各一所；武则天依《大云经》做为“女主君临”，令各州建“大云寺”；唐中宗令各州建中兴寺；唐玄宗令各州建开元寺。也是强调佛教有镇国安邦的作用。

当然，仿唐的日本东大寺也安奉了毗卢遮那佛的报身像，大佛高十五公尺以上，用掉铸铜七十三万九千余斤，黄金一万四千余两，白银一万二千余斤。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西元 752 年，唐天宝十一年）落成时，由太上皇圣武天皇（药师寺的景戒注解《日本灵异记》说他是胜德太子的转世）率文武百官莅临亲自主持。东大寺的完成是集合了南传、北传佛教之大成，铸造大佛的行基和尚是百济王的后裔；负责营建的国中连公麻吕是流亡日本的百济人后代；执行开光的是南印度婆罗门僧菩提昙那；法会的咒愿师是唐僧道璇；上奏佛乐的是越南占婆国的僧人佛哲负责。

西元 753 年，天平胜宝五年，被奉为日本律宗祖师的鉴真和尚到达日本九州。次年，鉴真到奈良，献上经论佛像等，并为圣武太上天皇、皇后、太子授戒。西元 759 年，唐肃宗干元二年，天平宝字三年，建唐招提寺，近代则成为律宗之总本山。

“奈良时代”后期的“天平文化艺术”是受到盛唐的影响，日本派出遣唐使带回唐朝的文化，被吸收融入成“大和文化”然后保留下来。平安时期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和“真言宗”。「平安朝」弘仁十四年（西元823年，唐穆宗长庆三年）正月，嵯峨天皇把位在京都市的东寺（空海亦曾为奈良东大寺的别当）赐给空海（774-835年）作为密教真言宗的根本道场，空海把从唐朝带回的佛舍利、曼荼罗、梵字真言、法具、论疏等都存放在此，后来仿唐长安青龙寺之例，天皇赐称此寺为“教王护国寺”，因空海以东寺为传法中心之故，称为日本真言宗之“东密”。

此同时也赐比睿山一乘止观院“延历寺”之号。这时期为鉴真律师（688-763年）所兴建的唐招提寺的讲堂，就是平城京部分宫殿所改建的。平安末年平重衡放火烧掉奈良东大寺等，到“镰仓时期”由净土宗僧重源担任“劝进”，负责募财及组织工作，请来宋朝的工匠陈和卿设计，重新修建并重铸大佛。重建的东大寺即采用宋代佛寺流行所谓的“天竺样”，为现今世界上最大的木构造建筑物。

桓武天皇即位，眼见政教弊害丛生，主要是各种政治社会及佛典的释义产生信仰上的不同，甚至冲突。为了刷新政风，终于延历十三年（西元749年，唐天宝八年）迁都平安京（今之京都 Kyoto），仿唐朝之长安城建造。进入「平安朝」以后，为了扫除宗教的弊端，下令禁止国师增员，并且严格选拔，任期六年。

唐贞元十一年（西元795年），更禁止官员、百姓将田宅、园地布施或出售给寺院，并改“国师”为“讲师”，诸国各置一人。主要目的是采取必要的手段，以断绝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但是对纯正的佛教发展则大加庇护，佛教新人物辈出，最有名的是开创天台宗的最澄大师和真言宗的空海大师。

“平安时代”（749-1192，时当唐天宝至宋绍熙年间）佛教的修行与一般庶民无缘，可以说只是贵族的佛教、阵护国家的佛教，这时期有平城、淳和、仁明天皇出家。而一般对日本佛教的分期，则以“平安时代”结束以前称为“古代佛教”，而且是属于祈祷的佛教。

日本的佛教为了与本土的神道融合，以减少其两百多年来的长期的抗性。到了“奈良时代”末期便产生了「神佛习合、神悦佛法、神信佛法」的思想，认为无论神也好、佛也好，其本体是同一起来源。神佛的分别，只不过是为了摄化众生、救济众生的方便而显现出来种种不同的形象罢了，神道信仰仍依附于佛教。所以，在观念上认为只要依靠神佛间的冥合和扶助，就能使国家得到守护，皇室才能巩固。为了配合这种思想，就在各处神社的境内盖了佛堂或僧院，并由僧侣来司掌社务。

当时所建的国家大寺也称“官的大寺”，因是历代天皇和皇室成员的“敕愿”建造的，也称“御愿寺”；属于私人的寺院，称为“定额寺”。为了让日本的神祇拥护佛法，神也接受佛法的供养。在神社中兴建佛寺，佛寺中也有神社，在“奈良时代”已经是很平常的地方信仰，这是“神宫寺”的源起。到了“平安时代”，又发展出“佛本神从”的「本地垂迹说」，认为佛是神的本源或本体，地方神是佛，为了度化日本而垂迹示现或应机权现，认定了许多神为大菩萨，如多度大菩萨、八幡大菩萨；伊势宫的天照大神，更被认为是本地的大日如来。

于是神社内的僧人（别当、社僧）经常在神前读经，举行法会，佛教便深深扎根于民间，并且与当地社会习惯融成一体。后来更融合了神佛互习思想以及祖先崇拜思想，大量建造家族祈愿的「氏寺」。以一般民众为对象，让庶民安奉祖先牌位的「菩提寺」或「香华寺」也在此期间出现，尤其“鎌仓时代”之后，出现天台宗的“山王神道”、真言宗的“两部神道”，标志「本地垂迹说」，越来越多主张神佛同体论、佛主神从说。如后来天皇也授德川家康为“东照大权现”之号，更分不清楚是什么了。

日本的寺院以其祈愿寺、神宫寺或菩提寺等不同的类别，所住僧侣的任务也各相异。其任务分成以祈愿为主、以社务为主、以檀务为主等等不同。平安朝以后，大寺通常在堂塔伽蓝之外，另盖子院或私房，作为僧侣们的生活处，而形成了「复合寺院」的规模。

执掌神宫寺的僧侣干脆把自己的住房当作生养子女的家庭住所，并让亲生子女能继承寺院的住房以及个人的私财，如京都石清水八幡的护国寺、伊势太神宫的法乐寺。其他以私财所建立的菩提寺，如醍醐之安东寺、日野的法界寺等寺院，是属于「妻带寺」。“室町时代”以后，则修验道行者所住的寺院大多成为「妻带寺」。这时期的佛教并未转变为在家佛教，虽然仍保有出家的形势，可是内涵却已经完全的改变。

「平安朝」初期，受到唐文化的影响，汉文字和汉文学十分盛行，更是天台宗与真言宗弘传的兴盛期。佛教在日本更加兴盛，信众把自宅直接当寺院使用，俗家和佛寺也就非常的类接。当时到处更出现了贵族把住家的正厅改造为佛寺的情形。如嵯峨天皇把离宫改成嵯峨大觉寺；仁明天皇迁移清凉殿为嘉祥寺；清原夏野把自宅当作京都太秦的法金刚院；把醍醐天皇外祖父宫弥益的旧邸改为京都山科的劝修寺。同时有些贵族选择山明水秀的胜地，兴建寺院式的别庄，得以一方面过着俗家生活，又可兼顾出家式修行的生活。如金阁寺、银阁寺无不都是兼顾出家、在家一体的寺院。

平安朝时代的佛教普遍密教化、贵族化，到藤原氏摄政以后，武士阶层崛起，

领主庄园制不断发展，天皇形同虚设，从天皇到贵族都有惶惑感和危机感存在，每代天皇让位后出家的更多，如清和、阳成、宇多、醍醐、朱雀、村上、圆融、花山、一条、三条、后一条、后朱雀、后三条、白河、鸟羽、崇德、后白河、后鸟羽等，其中白河天皇出家后称“法皇”，设院继续听政掌权，鸟羽、后白河、后鸟羽也是如此。

日本净土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日本的遣唐史终止于“平安时代”宽平六年（西元 894 年），当时以唐朝末期动乱和海上不安为理由，终止了“遣唐史”之举。平安中叶，武士思想抬头，许多浪人寄生在佛寺，产生了“僧兵”，僧侣为了信仰的不同，佛寺以僧兵为先锋，经常为争权夺利而相互斗争。当时随着僧兵作乱，而唐朝又有“会昌法难”，信徒以为人世的“末法时期”已经来到，而极思一个平和的净土。尤其西元 1142 年，宋绍兴十二年，康治元年，延历寺、圆城寺的僧众械斗，圆城寺僧众火烧延历寺；西元 1163 年，金大定三年，长宽元年，延历寺僧众火烧圆城寺，更造成乱象及末法信仰的无奈。

佛教“公传”入日本时，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思想和经典也逐渐传入。北魏时期是以梵文意译的「无量寿佛」称号之，隋唐以后才以梵音的「阿弥陀佛」出现。故圣德太子死后，其妃橘夫人认为他“应生于天寿国之中”。后代的净土信仰者则联想认为“天寿国”即阿弥陀佛净土早期在日本的称号。其实日本净土思想的兴盛，则是在九世纪末的藤原时代以后，由于社会上充满绝望与不安，并随着对「末法」思想的焦急而到来的。

日本净土信仰的兴起和以后净土宗的建立与天台宗有很密切的关系，天台宗的创始者智顛大师是提倡净土信仰的，而“入唐八家”之一的最澄（767-822）将净土信仰传入日本。净土思想原先是流行于中下阶的平民层，然后逐渐扩及于上流的贵族社会，贵族一面念佛求往生，一面沉缅于现世的物欲享受，社会上一度显得颓败极了。加上战乱频传，对被压迫的无知淳朴信众，的确是一大福音，并且念佛往生简易方便，净土的法门就越加兴盛（光是执持名号的嘴“念”，与现在部分的台湾佛教徒信仰情形有点类似），气势高涨到十分的狂热。

净土的法门大量宣传认为只要一心“念”佛，不管结婚食荤、无恶不作、多贪乐欲的一阐提（Icchantika，不相信佛法的人），完全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就可往生极乐世界（类似“带业往生”的宣导）。最澄的弟子圆仁（西元 794-864 年）入唐求法，曾到竹林寺，学到法照（生平不详，被称为善导后身。唐代宗永泰二年，西元 766 年，创“五会念佛法”）鼓吹的不断「音乐性」“念”佛式的“五会念佛法”。

“五会念佛法”是受《大无量寿经》之启发：“以清风时发五会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其闻音者得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此法配上抑扬顿挫的五音曲调，按长短缓急不同的节拍颂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其“六时礼赞”亦伴之以哀婉动听的曲调，产生感人（性）的气氛，容易受到宫女们的喜爱。

圆仁回国后第二年，即承和十五年（西元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在比睿山建常行三昧堂，作为修持法照的“五会念佛法”之所，也有不少僧尼皈依。如京都平等院的凤凰堂，就极尽人智与财力，建造宛如极乐世界的豪华宝楼阁及宝池，让建筑物内外仿佛是极乐净土。因此，遭致以正统佛教自居的南都（兴福寺）北岭（延历寺）强烈的不满，向朝廷奏请，禁止念佛的举止。

“鎌仓时期”（Kamakura period, 1192-1333年，时当宋绍熙至元顺帝元统年间）、“室町时代”（1334-1568年，时当元顺帝元统至明穆宗隆庆年间）重要的有曹洞宗、临济宗，有些僧人为了打破旧有佛教的腐败、混乱和日益脱离民众的局面，提出有别于中国的新说，创立了新的宗派。对于“鎌仓时期”到“室町时代”是为日本的“中世佛教”期，也是武士幕府政权的时期。

鎌仓是日本的第一个幕府「鎌仓幕府」的发源地，也是佛教的重镇。公元1452年，鎌仓民众捐款兴建了一座青铜阿弥陀佛的坐像，总高三点三五公尺，总重一百二十一吨，虽比东大寺的大佛略小了些，却是现今户外最大的大佛。

此时期有源空（号法然，1133-1212）创立“净土宗”，后来其弟子亲鸾（1173-1262）创立“净土真宗”；一遍（1239-1289）创立“时宗”；日莲（1222-1282）创立“日莲宗”。

而这些创立人都未曾留学中国，把已在日本广泛流传的汉译佛典和中国人的佛教著作，按照自己的理解，创立了新的宗派，这些宗派则具备了日本佛教鲜明的民族特色。此时期形成了天台宗的「山王神道」、真言宗的「两部神道」，律宗的复兴也产生了「南京律」与「北京律」，佛教更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建立了「寺檀制度」，规定了寺院与信徒家庭间的隶属关系。而亲鸾则类似基督教的马丁路德公然带妻住寺，否定出家主义，其纯粹以信仰为主的立场，对后来的日本民族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净土宗对于“无戒”之人，甚至说“恶人”念佛也可以往生或成佛，是具备了深入人性的洞察力，有着令人很难脱离的魅力。果然被日莲批判为邪法、恶法、谤法，并说念佛者会下地狱。日莲把《法华经》（Lotus sutra）信仰称为正法，

提倡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唱题修行法。日莲曾上书幕府用强力禁止净土宗流行，书文写说：「念佛是无间地狱，禅宗是天魔所为，真言是亡国恶法，律宗是国贼妄说。」当然招怒了四大派，在文永八年（西元 1271 年）被判斩罪，后减为流刑，流配佐渡。但三年后，自任为「上行菩萨」的日莲再度获赦而返回鎌仓，结庐于身延的山中，后建为久远寺，成为法华信仰的中心道场。

由于天台宗寺院拥有僧兵，明穆宗隆庆五年（西元 1571 年），元龟二年，无法容忍寺院拥兵与政府对抗，织田信长（西元 1534-1582 年）攻入比睿山，将寺院焚毁。十年后又杀高野山僧众 1383 人。明万历十三年（西元 1585 年），丰臣秀吉（西元 1536-1598 年）烧毁根来寺，又攻入高野山，威慑当地僧众。

德川幕府于迁都江户（今之东京 Tokyo）后的“江户时代”（西元 1645 年，清顺治二年以后）统治日本时则开始采取“锁国政策”（直到西元 1853 年，清咸丰三年为止），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禁止日本人与海外交往。原因是于西元 1637 年日本爆发了以天主教为主的岛原农民起义，从此对宗教的限制也很严谨，为杜绝天主教的死灰复燃，将国民纳入佛教组织中，建立了「寺檀制度」，让寺院与檀家的关系制度化。僧侣具有“户籍公证”的特权，国民的生死婚迁，都必须在寺院取得证明。其主要目的则是为了控制民众，连日本学者就认为：那是“只用世俗权力无法完全贯彻其支配体制时，就利用宗教的力量。”当然寺院非常乐意执行这般政策。

于是佛教陷入安定保守、缺乏进取、思想迟滞的堕落情形，诸藩还曾实行“废佛毁释”的命令。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还政于明治天皇，明治元年（西元 1868 年，清同治七年），宣布“神佛判离”令，宣誓文：「此次王政复古，基于神武创业之始，改为诸事一新，“祭政一致”之制度。」恢复任命神祇官，神社与佛寺分家，禁用佛语称呼神号，禁供佛菩萨形像的神像，将长期的神佛分离开来，使神道成为国教，建立“神社制度”。明显“神为本地”，佛只是“垂迹示现”。

在以天皇为首的极权统治体制之下，传统佛教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也提倡忠皇爱国，宣传护国精神。日本真宗就有「王法为本」、禅宗有「兴禅护国」、真言宗与天台宗有「镇护国家」的观念，产生不少僧人对天皇制度的效忠拥护，以及对外战争的支持，并且争取了「僧侣参政权」。虽然在一片因战争利益而违背佛陀的教诲中，仍有少数反战的僧侣或信徒，可是前者不是被逐出僧团，或最终被捕下狱。

日本佛教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政权到明治元年，归为“近世佛教”；“明治维新”以后就是“近代佛教”。西元 1868 年德川幕府被推翻后，日本便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日本。明治五年（西元 1872 年，同治

十一年)四月,解除僧侣不得食肉、带发、娶妻的官制,下令僧侣使用俗姓,将僧侣世俗化、在家化,用以宣传神政思想。最后却变成佛神纠缠不清,佛教走向形式化,几乎是麻痹的情形。

佛教诸宗见佛教陷入困境,于是纷纷派学者前往先进国家考察,并批评政府之不智,并展开「护法活动」。明治八年四月,政府停止“神佛合同”之说教。同年五月,解散大教院,允许宣说佛法各宗教义。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宪法,对信仰自由,赋与法律之规定。

日本近代以后,各宗在组织上以本山为首,政府把委任住持及制定“宗制”、“寺法”等权交给各宗“管长”。明治时期有十二个宗派流行,其简况如下:

(一)“法相宗”,以奈良的兴福寺为本山。(崇信《唯识三十论颂》)

(二)“华严宗”,以奈良的东大寺为本山。

(三)“天台宗”,以比睿山的延历寺为本山。

(四)“真言宗”,以京都的东寺为本山。

(五)“融通念佛宗”,以大阪的大念佛寺为总本山,下有四个中本山。

(六)“净土宗”,以京都的知恩寺为总本山,下有四大本山。净土宗”西山派有四个总本山,“管长”轮流任职一年。

(七)“临济宗”,有相国寺、建仁寺、南禅寺、妙心寺、天龙寺、建长寺、东福寺、大德寺、圆觉寺、永源寺十派,各设有“管长”。

(八)“曹洞宗”,以福井县的永平寺和石川县的总持寺为两大本山,设有两位“贯首”,以一年为期轮流主持“管长”之职。

(九)“真宗”,有本愿寺派、大谷派(东本愿寺派)、高田派、佛光寺派、兴正寺派、锦织寺派、毫摄寺派及专照寺、诚照寺、证诚寺三门徒派,共十派各设有“管长”。

(十)“日莲宗”,以山梨县身延山久远寺为总本山。下又分十派,各设有“管长”。

(十一)“时宗”,以藤译的清净光寺(游行寺)为本山,今尚存七派。

(十二)“黄檗宗”,以京都宇治的万福寺为本山。

西元 1905 年才从“真言宗”独立出来的“律宗”,则以奈良的唐招提寺为本山。因此,近代日本佛教共有十三宗。目前则有七大系(净土、禅、真言、天台、日莲及其他),内含 270 个宗派。

仿照中国洛阳城而建的京都,也称为洛阳。建于西元 798 年,唐贞元十四年,位于京都东山境内的清水寺,因为寺中拥有一处清泉而得名,但是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正殿,整座建筑构造都没有使用到一根钉子,寺前的木质阳台就建在断崖之上,以数十公尺的长木将平台悬空支撑着,故以「清水舞台」闻名于世。

京都有许多著名的寺庙，如三十三间堂、延历寺、东本院寺、西本院寺、东寺、万福寺。延历寺是天台宗的总本山；东寺是真言宗的总本山；万福寺是黄檗宗的总本山

千年古都京都的金阁寺与银阁寺也颇负盛名。曾经出现在三岛由纪夫笔下的金阁寺（舍利殿），是足利义满将军所建，虽然才只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却因此与日本的富士山（Mt. Fuji）和艺妓并列为日本的典型代表。金阁寺楼身贴有金箔，样式融合「唐样」、「武家」、「寝殿」三种风格，覆盖着宝塔塔刹屋顶，刹上装饰有凤凰。金阁寺前的「镜湖池」是最佳的赏枫地点，这里属于池泉回游式的经典庭园，池畔种有许多枫树，常做为猎取金光闪亮的金阁寺的最佳背景；银阁寺最有名的是枯山水庭园，以及象征中国西湖的「银沙滩」。庭园中央的「向月台」是白砂堆成圆锥形的小山丘，可以反射月光。还有一条两公里长的「哲学之道」，因为昔日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经常在此散步、思考，是京都最适合散步的道路。

○云南及古代南诏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现在的云南省住着二十六种民族，其中有中国古代西北一带迁移而来的的羌、氐族人，这些族人原居陕西、甘肃、青海、西康、四川、西藏一带，后来南迁到云南，以至于缅甸。吐蕃人及南诏国人就是属于这个种族的，云南古代的爨族（东爨是彝族）也就是“羌族”南移者。

而“诏”字是古代“氐”族称“王”之词，《晋书·前秦苻坚载记》：「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云“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新唐书》之〈南诏传〉说其为「哀牢夷之后，乌蛮别种」，“乌蛮”即今之乌爨族，以裸罗为代表。氐、羌族移居云南一带，与操藏缅语的“彝族”和“白族”共融，所形成的南诏语言，就是唐代洱海地区的白蛮语和乌蛮语。

西元七世纪中叶，于今云南的蒙舍诏本来是乌蛮六诏之一，位处最南边的巍山，故称为南诏。在细奴罗（西元 649-674 年在位）的领导下开始壮大其势力。唐调露二年（西元 680 年），吐蕃向南扩张势力，南诏国部分地区一度臣服于吐蕃，经历吐蕃奴隶主 114 年的统治。

开元十八年（西元 730 年），皮逻阁（老挝人称为坤博隆）在唐朝的支持下，兼并五诏（蒙隼诏、越析诏、浪穹诏、濠 诏、施浪诏），灭道明国，统一洱海地区，自称“南诏王”，成立以大理地区为中心的“南诏大蒙国”。南诏与其余五诏族人的命名，都是「父子联名制」，细奴罗生罗盛，罗盛生盛罗皮，盛罗皮生皮罗阁，唐朝曾赐皮罗阁名为归义。唐天宝十一年（西元 752 年），南诏王阁罗凤叛唐，并将唐朝势力逐出云南，转而归附吐蕃，接受吐蕃册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两者交好有四十二年，“藏传佛教”也于此期间进入南诏。贞元十年（西元 794 年），又转而连唐反吐蕃，夺取了神川都督地和昆明城。又南征茫蛮、黑齿等部落，拓并土南与泰国南奔一带的女王国接壤。

于八世纪中至九世纪末，南诏国势强盛，版图北抵大渡河，与唐朝以一水之隔；西北与吐蕃为邻；东至今之贵州遵义和广西西部。老挝、越南、泰国与缅甸四国的北部，都曾被南诏征服，是当时中土西南边的一个大国，而且时时侵犯边境，为唐朝的心腹大患。目前位在昆明城西的圆通寺，就是南诏国兴盛期所建。圆通寺原名补陀罗寺，曾毁于兵燹，元大德五年（公元 1301 年）重新整建。明清两朝亦进行不同规模的修葺，但目前所见的大都是清式建筑。

唐朝入南诏的路线主要有“通安南道”、“通西川道”和“通黔中及邕州道”。唐文宗太和三年（西元 829 年），南诏国入侵成都，掠走匠人数万，从此南诏手工艺技术不输蜀中。唐昭宗天复二年（西元 902 年）权臣郑氏弑杀南诏王舜化贞，成立“大长和国”，南诏亡国。但此后三十多年，内部斗争剧烈，前后分别成立有天兴国、义宁国。直到后晋天福元年（西元 937 年），白蛮贵族段思平篡位取得政权，建“大理国”（西元 937-1094 年，时当后晋天福至宋哲宗绍圣年间），后裔改为“后理国”（西元 1096-1253 年，时当宋哲宗绍圣至宋宝佑年间），均曾自外于辽宋，为云南地区之一大国家。元代时大理国地区被划入版图，设置有云南行省辖区，于是取代了大理国。

“大理国”段氏采取闭关自守，不求大作为，唯独在信仰佛教上唯诚唯敬，百姓柔顺，乐善好施，敬奉三宝是当时社会的风气。因此古人说：「大理（叶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钟鸣；伽兰殿阁三千堂，般若宫室八百处。」

谈南诏国佛教，应该也谈及今天的云南佛教状况，云南自古有「妙香佛国」的美称，据说佛教约于西元七世纪时，传入位居中国西南的云南地区，佛教弘传十分兴盛，其四大宗派齐全，可分“梵文经典系”的佛教（阿陀力教，即阿嵯耶教、阿闍黎教，属印度密宗，称为“滇密”）、“汉文经典系”的佛教（汉传佛教，属“唐密”或称“汉密”）、“巴利文经典系”的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藏文经典系”的佛教（藏传佛教，属“藏密”），这是很特殊的现象。

南诏的领域曾达今日缅甸的北部一带，据说最早进入南诏的佛教是“阿咤力教”，唐穆宗年间（西元 821-824 年），中印度阿闍黎师（Acarya，音为阿咤力，即规范师或导师）赞陀崛多（一作室利达多）由摩竭陀路经当时缅甸的骠国到达南诏，传播“阿咤力教”，受到南诏王细奴逻的崇敬，而尊为国师，并在鹤庆建元化寺，开五密坛场，施行密法。

此时期正是大乘佛教与印度教相结合时期的第二阶段，为“中期正纯密”，或称“左道密教”，崇拜大神摩诃迦罗（Mahakala 大黑天，在印度教是湿婆神的别名，为湿婆再破坏世界时的黑暗形相，藏传佛教也崇奉此尊），有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轨，推崇儒教，兼融巫术，并融合了南诏的风俗、习俗，成为“阿咤力教”，适应云南的自然崇拜，为民众祈雨禳灾，发挥密法咒术的威力。他的弟子张子辰、罗逻倚等也由西印度到南诏，相继传布“阿咤力教”，时称「南诏七师」，即七位灌顶国师。直到近世“阿咤力教”仍传承不绝。

元代元统甲戌年（西元 1334 年）所立的《故正直恭谦和尚墓碑铭并序》刻有：「南诏归义王皮罗革之嫡男蒙阁皮，厌俗而剃。于时公卿子弟洎士民之俊秀，从之游者以千数，咸曰：王子仁人也！同日 □ □ 五百余人，举国追慕不已。诏曰：干竺婆罗门僧，求佛而在家者。遂命以世禄，尚以贵属，号“师僧上首李畔富和尚”。戒行拔萃，为世宗匠，神功道尊，播在人口。」甚至建国三百多年间，历经二十二位的君王，就有十位出家为僧。也因为帝王的出家，佛寺自有雄厚的文化实力，于是僧人都受到民众的尊敬，傣语也称僧人为“康朗”，就是知识份子的意思。

“求佛而在家者”就是可以娶妻生子的在家阿咤力，可以传授后代，代不乏人。“师僧”即阿咤力轨范师、灌顶师。“上首”就是“首座”。也正因为阿咤力教是通过父子相传，兄弟相传，不着文字，具有极大的秘密性，这是“滇密”的特征之一。

“阿咤力教”主要的经典是《金刚顶经》、《大日经》、《苏悉地经》。“阿咤力教”供奉的本尊之一是大自在天化身的“大黑天”神（Mahakala，摩诃迦罗），却又是“唐密”和“藏密”熟悉的护法神之一，特别对大理、昆明地区彝族、白族、汉族佛教徒有很好亲切感，所以流传“大黑天”神的神话也很多。

元代时“汉传佛教”在云南地区发展顺利，对“阿咤力教”产生排挤和融合，统治者甚至将“阿咤力教”视为邪教、“土僧”，迫使“阿咤力教”进入农村，但是“国灭教不灭”，最终演变成为云南地区的地方民族宗教，一种没有固定寺院，只在家中设坛作法事的民间风俗信仰。但明朝时还专设「阿咤力僧刚司」与以统理。

不过，根据《续修马龙县志》记载，县东四十里龙鼎寺，「相传建自蜀汉，古刹中最久远」。《大理县志稿》记载，大理宏圣寺「相传为周阿育王建」；感通寺「东汉时建」。《南诏野史》有谓：南诏蒙氏为阿育王后裔，其实只是“君权神授”的玩弄手法，因蒙氏王室崇信佛教，便伪托为阿育王的后裔，用以取得民众的虔信。正如羌族后裔的吐蕃贵族，也宣称是印度王子之后，都是应宗教需要的谎言，与历史事实根本违背。

《永昌府志》记载，保山县北三十五里卧佛寺，「建自汉时」。东汉时大理为永昌郡叶榆县，保山为永昌郡治所不韦县，马龙为益州郡同濛县。汉时川蜀往身毒道起至蜀郡（成都），中途经雋郡（西昌）、益州郡（滇池东南）或永昌郡（保山），南下进入缅甸，西至身毒。马龙龙鼎寺在滇池东北，大理宏圣寺在洱海西岸，保山卧佛寺在入缅之要冲上，这些寺都在蜀地往身毒道上。滇池、洱海为宜农地区，又处于进入富庶的蜀中的滇缅古道途径，方志说这些古寺创建于东汉蜀汉之际，似有可能，则云南佛教的传入，早在西元三世纪以前。

目前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及比邻西藏芒康等地，藏族居民盛行“藏传佛教”中的黄、红、白派教派，还有古老的黑本“仓巴教”和白本“顿巴教”；丽江县及维西一带的纳西族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噶举派（白教）黑帽派和红帽派；宁蒗县永宁及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和普米族人信仰黄、白教为主，信花教的较少。原来土著信仰的宗教如纳西族的“东巴教”（“东巴”就是祭师）、摩梭人的“达巴教”、普米族的“汗归教”都被藏传佛教化，土主神、地方山神、湖神、泉水神也都被“藏传佛教”所吸收，所以现在云南的“藏传佛教”有当地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但也可以反过来说，是“东巴教”学了“藏传佛教”，才保存了现今的特色。

云南的“藏传佛教”与当地的土司有密切的关系，但当时尚未形成「政教合一」，而一直是相互依存的现象。寺庙没有太多的土地，没有农奴，上层僧侣的财产及权势也很有限。僧侣不担任土司政权下的官吏，所以保持着“政教分离，教不参政”的特色。

元代至元十七年（西元 1280 年），元西台御史郭松年巡行云南三年，在《大理行记》写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殫记。」

明代谢肇淂在《滇略》卷四说：「叶榆（大理）以西接天竺国，故自唐宋以来，崇奉释教，日甚一日。朔望则裹饭袖香，入寺礼佛饭僧。俗云：信三宝家，

永为和合。」述律杰《重修大胜寺碑》记说：「古滇居民慕善，斋洁茹苦食淡，手捻菩提珠，口诵阿弥陀者，比比皆然。由其地连西竺，与佛国通，理势然也。」又有袁嘉谷在《滇南释教论》中盛赞大理国佛教：「真佛化之妙境，盘盘数千里，悠悠数百年。娑婆界中坤舆广大，历史陈述未见有实行佛化如此之深且久者也。」

大理由于佛教兴盛，佛教建筑及造像艺术甚为发达。白族的寺庙建筑与民居关系密切，寺庙之立面外观、装饰和平面布局多与民居相似。因有此特殊的地方美感，故在《云南通志》中记说白族的建筑物成显出：「恬淡清习，肃然寂然之境，有以消人势利之心。故达人高士涉世既倦，往往有托而逃匿。」

大理地区的佛教寺院配置，与中土传统相同，中轴线多采南北坐向，置山门、前殿、正殿、法堂，或再加藏经阁，东西两侧为配殿（安排有伽蓝殿、三圣殿、药师殿、弥勒殿、观音殿、韦陀殿、金刚殿、开山堂、祖师堂等），僧房、斋堂、方丈室、香积厨、职事室、茶堂安置在左侧；朝山香众之客堂、云会堂则在右侧。

大理最完整的中原传统佛寺，现存仅有的是位于宾川县西北五十余公里鸡足山的祝圣寺，其规模宏大。该寺在三国蜀汉时便建有小庵，从唐至明代则发展成以寂光寺为主的八大寺、七十一丛林。清光绪年间，更扩展以祝圣寺为中心的三十六寺。文革浩劫让名山几乎不存，直到公元 1979 年才陆续整修，新建之迦叶殿、观音殿，建筑装修都已白族化，墨彩敷色、门窗雕刻材料均为民居风格。

云南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地区，居住有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的佤族，几乎“村村有佛寺”。佛寺的规模为大殿、僧舍、鼓房三部分，如果是“中心佛寺”以上的佛寺都设有布萨堂（诵戒堂）和藏经阁，较大的佛寺便建有佛舍利塔（或高僧骨灰及遗物塔）。“上座部佛教”和地方原始宗教的密切融合关系，可从佛寺大殿两侧或前面通常建有“底布拉”的神龛看出，“底布拉”神是一种灵魂转化的观念性神，是作为专供保护佛寺的神灵用的。

在云南不论是群众的信仰或某种其他的仪式，都与原始宗教的神灵崇拜结合在一起，这种宽容性也一直是云南佛教的特色，而且“上座部佛教”还保存有“婆罗门教”的繁琐礼仪。通常“上座部佛教”的佛寺大殿都只供奉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塑像。西元 1569 年，召片领刀应孟娶缅甸金莲公主为妻，公主即在景洪兴建缅寺，缅寺从此大兴。“上座部佛教”进入云南后，在德宏地区的缅寺建有佛殿、泼水亭、僧舍和塔，受到汉文化的信众需求，佛殿还加供观音菩萨像；西双版纳地区，佛寺里建有佛殿、经堂、僧舍和塔，也允许供奉女性的“水井神”塑像。

“上座部佛教”的佛寺建筑形式，大概可分为宫殿式、干栏式、干栏宫殿混合式三种形式。宫殿式佛寺一般建有大殿、僧舍、鼓房、围墙、山门；干栏式的

建筑如民间的竹楼形式，较为简陋，大殿为一楼一底的两层建筑，殿堂设在上层，附设僧舍；干栏宫殿混合式的佛寺，呈现两者的特点，大殿也是上下层，下层中空，上层的殿堂内部陈设与宫殿式相同。傣族的寺院有佛殿、泼水亭、僧舍等，屋顶大多高耸，采用“歇山式”，在大面积的屋面上分作高低三段或五段处理，打破大屋顶的呆板形象，并在各条屋脊上成排布置火焰状和各种兽状的庄饰，让屋顶充满着丰富的气氛。

迪庆州藏族寺院中的僧舍，一般都是依照当地民居的形式建造。如中甸和德钦等地多为“土掌式房”形式，维西等地则多为“干栏式”建筑。寺院中的大殿等主体结构，基本上传统“碉房式”建筑形式；摩梭人、纳西族和普米族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筑，主体结构都保持着藏族的风格，但不同于藏族地区“碉房式”建筑，而与汉族、白族地区的庙宇建筑形式相似，采用土木砖建造，更因受到汉族、白族、纳西族建筑艺术的影响，故体现出多民族的融合特典。在云南地区的寺院，有着多种文化交融的风格，各具特色，因此也证明无法定义什么是佛教建筑。

“藏传佛教”寺院在云南藏族境内地区现有 24 座，其中属于黄教格鲁派的有 13 座，白教有 7 座，红教有 4 座。本章仅择代表性介绍如下：

黄教格鲁派的“噶丹松赞林”是五世达赖赐名的，为藏族区“十三林”之一，后经清帝雍正定汉名为“归化寺”，建于清康熙十八年（西元 1679 年）。位于云南中甸县城北四公里的归化寺，座落在佛屏山山麓，全寺仿拉萨布达拉宫的布局，沿坡层迭而上，占地约 33 万平方公尺，“扎仓”和“吉康”两主寺耸立在高阜中央，八大“康村”（僧侣基层组织，学经之处）和“觉厦”、“西苏”两个事务机构及活佛的静室和数百间僧舍分布其间，成为藏式碉城式的建筑群，城垣设有瞭望台、哨楼、碉堡以御盗匪，有如一座庄园城堡。

归化寺的主寺“扎仓”（佛学院）坐北向南，是五层建的藏式碉房建筑，为石木结构，屋顶覆镀金铜瓦，殿宇屋角有兽吻飞檐，是汉藏混合的造型。而寺中碉桶内壁廊的屏门、花窗，其雕刻艺术的技巧和表现方式，有着浓厚的白族与纳西族的建筑艺术特色。

始建于清雍正七年（西元 1745 年）的寿国寺，位在维西县康普乡岔枝行政村驻地西北的喇嘛寺自然村，因地名又被称为康普寺。先是为了拥护清朝首次派流官治理该县而取名寿国的，寺的藏名为“达吉林”。因被火焚毁，迁到现址重建于乾隆三十五年（西元 1770 年）。主殿以汉族建筑风格为主体，容纳了藏族艺术特色，由山门、正殿、侧殿组成一座四合院，占地 2600 平方公尺。正殿以三重檐攒尖顶覆盖，殿内供奉释迦牟尼佛、大宝法王和二宝法王，以及莲花生大

士像。

上世纪的电影名片“失落的地平线”中提及的“香格里拉”，据说就在云南省西北角落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盛产黄金的丙中洛区，它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驼峰航线”经过的航线下。丙中洛乡的标标人说「以后再回来」为“下格里拉”，藏语发音“甲格里拉”是说「佛教圣地」的意思，所以那里有一座“普化寺”，可能就是电影中所描述的“香巴拉宫”。普化寺建于清乾隆三十一年（西元 1766 年），由白教的松姿喇嘛所兴建，原称“飞来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参访，好圆一下影片中那诱人的美梦。

○越南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列传〉四十八叙言说：「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今之中圻）。其僂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罗马）、天竺（身毒），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改盖渺，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今采其风俗粗著者，缀为海南传云。」

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Vietnam）。“安南”（An Nam）原名“交趾”（Giao Chi，今之北圻），很早称为“文郎国”（Van Lang），是由「鸿庞王朝」（Hung dynasty）所建立的国家，又叫“交州”，秦时属“象郡”（今河内 Hanoi）。秦始皇前后发了百万士卒征伐南越（Nam Viet），必定有不少人流落这些地区。越族是中国南方的古老民族，居住在东南沿海和珠江流域一代，过着农耕和渔猎的生活。秦代伐越同时，也移徙了很多人使与百粤杂处，我们可以了解从秦汉以后，汉、越民族的血统是相互混杂的。秦末南海郡尉赵佗（Trieu Da, Chao Tuo）获知陈胜等作乱，豪杰叛秦相立，为防盗兵，聚兵自守，秦灭后，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高祖定天下后，嘉许赵佗为中国劳苦功高，于十一年（西元前 196 年）派遣陆贾立赵佗为南越王，正式又统领“南越”或“南粤”（越、粤两字是相通的），领地为原南海（广州）、桂林、及象郡。所以，至汉初时的“南服”又是为三个越族所建立的国家，即东瓯（浙江永嘉）、闽越和南越。可见自古以来浙江、

福建和广东一带，汉、越民族血统交流混杂已经很长久了，其源远流长，实为一体。

汉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 111 年），派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征讨“南越”叛相吕嘉，领大军平定“百越”（Bach Viet），将之纳为版图，名为“交趾”部，下置南海、苍梧、郁林、河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其中交趾（今河内）、九真（今义安）、日南（今广治）属今之越南领土。

三国时代，吴国境内的山越曾与汉族共同开发了江南，越族人学到了汉族文化，而且汉人文化在此后影响交趾有一千年之久。直至，西元 820 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所绘制的〈方阵图说〉中，尚设有安南（交州）都护府，管辖越南。唐末、五代十国以后，中原地区战乱分起，越南吴朝兴起，就脱离与中国的关系，自成一个国家。

古代越南中部的占婆王国（Champa）并不是“越南族”人的国家，而是由拥有马来——玻里尼西亚传统，以及印度教文明的“占婆族”所建立的国家。不过，现在的“占婆族”只剩下数万人，已成为越南的少数民族。西元 192 年，正当汉朝政权瓦解之时，有“林邑”（古占婆国，即安南中圻）在扶南的帮助下建立帝国，其所占领土地，原为汉朝的象郡象林县，后来逐渐扩充到今之顺化（Hueh）一带，即今越南横山以南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以林邑作为扶南与汉朝间的缓冲地带，所以，有可能越南当时曾从已印度化的扶南传入佛教与“婆罗门教”（Brahman，梵），两种宗教并立，也常常混合。在宁顺有碑文，记载一大臣，既建佛寺以祈福，又建大自在天王祠以积善。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西元 446 年），宋元嘉二十二年，林邑侵犯中国边境，宋交州刺史檀和之领兵进讨，占领林邑京城荣轿，并将林邑置郡纳入版图。到了六世纪，占婆王国便脱离中国的统治，有了繁荣昌盛的时期。八世纪爪哇国曾侵略占婆，但是没有成功。

西元 1145 年，高棉人征服占婆王国，但两年后，一位新的占族王起而推翻高棉人，他的继承人则挥军入侵柬埔寨的吴哥。从十三世纪开始，占婆王国分别与高棉人、越南人、蒙古人展开战争。到了十五世纪，占婆王国终于瓦解，十七世纪时遭越南人合并，南圻就并入越南，越南文化从此便往南发展。

唐朝末年，也就是西元 938 年，越南「吴氏王朝」（Ngo dynasty, 939-967）的吴权（Ngo Quyen）在白藤江（Bach Dang river）歼灭中国南汉的大舰队，才如愿脱离，不再为汉族的藩属。西元 939 年，越南独立成为「大越帝国」（Dai Viet），可惜吴权死后，国家陷入混乱局面。后来虽有势力强大的诸侯丁部领（

Dinh Bo Linh) 击败其他诸侯，建立大瞿越国 (Dai Co Viet, 968-979) 自立为丁先皇帝 (Dinh Tien Hoang De, 发音与闽南音同)，可是仍然被侍卫刺杀而亡国。接着是黎桓自立为黎大行 (Le Dai Hanh) 皇帝，称为前黎朝 (Tien Le dynasty, 980-1009)，但却维持不久。

西元 1009 年开始，越南 (Vietnam) 出现三个大王朝——「李朝」 (Ly dynasty, 西元 1009-1225 年，时当宋真宗大中祥符至宋理宗宝庆年间)、「陈朝」 (Tran dynasty, 西元 1225-1400 年，时当宋理宗宝庆至明惠帝建文年间)、「后黎朝」 (Le dynasty 西元 1428-1787 年，时当明宣宗宣德至清乾隆年间)。

西元 1437 年，明朝册封黎季牦之子黎太宗 (Le Thai Tong) 元龙为安南国王，自此越南从中国藩属独立出来。越南安南国在这三大王朝的治理下维持了七百年来的安定局面，虽说是独立，却也继续对中国称臣入贡。但是与中国仍有干戈相向，蒙古大军和明朝都曾入侵，却都被越南击退。

越南语源自于澳亚 (Austro-Asiatic) 语系，又受到汉文、藏语、泰语的影响，要学越南语的发音并不容易，其基本音节有六种语调，意思完全不同，很容易发生混淆。西元 1627 年，明天启七年，年仅二十七岁的法国青年耶稣会传教士罗德 (Alexandre de Rhodes)，将越南使用千余年的汉字改成目前的通用罗马拼音字越南文国语 (Quoc ngu, 承继汉唐时代的语音，与今之闽南音同)。

但是河内现今仍保存完好的文物，在著名的文庙 (Van Mieu) 庭园中一处天光井池旁，参天古木群下有着八十二块石龟所驼负的石碑上，刻记着从西元 1442-1779 年共 1306 位进士的姓名、诗文及其学术上的成就，他们是研读文学、哲学、中国古文与越南历史，经过考试取得资格的。因此，我们深深了解北越人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法国人在西元 1915 年 (顺化则是在 1918 年)，下令停止了越南的科举考试，并严格禁止中文的使用达七年之久。可是在越南的村落中，这些被法国人禁止的中文与古越文，仍然被使用至今。

清嘉庆九年 (西元 1804 年)，清朝还正式赐予国号「越南」，直到清光绪十一年 (西元 1885 年)，清朝与法国签定天津条约，才放弃越南的宗主权，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国名被改为「南部越南交趾支那」 (Southern Vietnam Cochinchina)，为法属支那 (柬、越、寮) 之一员。因为曾受法国人的殖民教育，现在老一辈的越南人，还会说法语。而靠近中国地区的北越人，或许祖先来自百越，仍然听得懂闽南话或广东话。

西元 1930 年胡志明在共产国际组织协助下，在香港创立越南共产党，西元 1941 年在中国南部成立越南独立同盟 (越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法

军展开游击战。西元 1945 年法军被日军解除武装，撤离河内，越南保大皇帝（Bach Dinh）宣布独立，但实权仍在日军手中，同年八月日本战败投降，越盟发动起义，保大皇帝逊位，胡志明再度宣布越南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负责解除越南南方日军武装的英国，竟然支持法国卷土重来，所以爆发了第一次印度支那（Indochina）战争（1946-1954），后来法军在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役中败北，法军自越南全面撤退，经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以北纬十七度为界线，将越南临时分为南北，北方由胡志明（Ho Chi Minh）领导，称为北越；南方为吴廷琰（Ngo Dinh Diem）任总统的越南共和国。

越南分为南北之后并不平静，北越屡次潜入南方宣传统一及游击战，导致美国派兵干涉，终致引起第二次的越南战争（Second Indochina War 越战，1965-1975 年）。但因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很高，西元 1973 年美国与北越签下停战协定，美军自越南撤军。

西元 1975 年越战终止，北越共产党军队全面解放越南，次年，南北越正式统一，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将首都迁往河内（Hanoi），将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目前全国领土面积有 329,556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 7,756.2 万人（有说是 7020 万）。

后汉献帝兴平二年（西元 195 年），著有《牟子理惑论》的仓梧学者牟子到交趾避难，据说此时越南佛教是由中国传入。故有学者杨曾文指出，西元二世纪末，大乘佛教从中土传入越南，在四、五世纪得到较大的传播。后从中土又传入“禅宗”、“净土宗”。从九世纪到十三世纪末，越南形成民族化的佛教宗派，属于禅宗系统的“无言通派”、“草堂派”和“竹林派”，并先后被「李朝」（西元 1010-1224 年）和「陈朝」（西元 1225-1405 年）定为国教。近代越南佛教是佛教与儒学和越南民族信仰相结合的宗教，有其独特的色彩。

西元六世纪末，由中国学禅后又进入越南的印度僧人灭喜（毗尼多流支）在越南河东建了法云寺，成立灭喜禅派。「前黎朝」时的万行禅师是灭喜的第十二代弟子，万行禅师在「前黎朝」曾为国师，后来支持李公蕴（Ly Cong Uan）建立万春王朝（Van Xuan）的「李朝」，又曾度千余人为僧，所以“灭喜派”在李朝前期兴盛一时。

西元 820 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唐僧人无言通在越南北部建立一座建初寺。李朝太宗帝曾出家成为“无言通派”第七代禅师，作有一偈：「般若真无宗，人空我亦空，过现未来佛，法性本相同。」可见禅宗无言通派对李朝有很大的影响。

西元十一世纪时，李太祖（Ly Thai To）来到大拉（Dai La），忽然看到一条金龙从湖中升起，便决定将首都由华闾（Hoa Lu）迁至大拉，并将大拉改称升龙。中国禅宗高僧草堂（雪窦明）在升龙（河内）开国寺建立禅宗“草堂派”。当时越南皇帝李圣宗（Ly Thanh Ton）鉴于国内佛教教派众多，希望能够统一各派，把神权操控在手中。于是他看重草堂禅师，尊之为国师。

陈朝仁宗（西元 1279-1293 年在位）好佛，禅位给太子，在元成宗大德三年（西元 1299 年），往安子山出家修行，自称“香云大头陀”，后南游占城，返越后又自号“竹林头陀调御觉皇”，又号“竹林大师”。他是越南自创禅宗派别“竹林派”的第一代祖师。

有着越南民族特色的“竹林派”，宣扬「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的禅宗思想；第二代祖慧宗禅师的一首禅诗曰：「迷去色空色，悟来色无空，色空迷悟者，一理古今同。」元成宗元贞元年（西元 1295 年），陈英宗遣使向中国求《大藏经》回国颁印，西元 1299 年印《佛教法事》、《道场新教》颁行天下，「陈朝」佛教至此极为兴盛。后来也出现了莲宗派和观禅派等，除了奉行临济宗禅法以外，还主张禅净融合、禅教一致的思想。

胡志明市（Ho Chi Minh City）旧名西贡（Saigon），原是南越的首都，因受到法国人的苦心经营，有“东方小巴黎”之美称。胡志明市最古老的建筑物兴平郡觉林寺古迹，是中国明香季瑞龙居士创建，建筑的风味有点像台北的龙山寺。此建于十七世纪末的伽蓝寺（Gia Lam Pagoda），曾在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 1900 年）重修，寺内梁柱上有越南古文字刻成的镀金碑铭，墙上挂有历代高僧像，并有精美的菠萝木雕像。

胡志明市内另有色彩最富丽堂皇的玉皇寺（Ngoc Hoa Pagoda），大约在西元 1892 年由广州的佛教徒所建立。建于西元 1803 年的觉圆寺（Giac Vien Pagoda），寺中保存有 153 尊手工精美的雕像，里面有一顶珍贵华丽的轿子，是阮朝皇室赠送给创建高僧觉圆的。

胡志明市最新也最大的佛寺永严寺暨佛学院（Vinh Nghiem Pagoda），落成于越战期间西元 1973 年，由于曾获得日本友谊协会的协助，此寺外观具有日式佛塔的特色，融合越南传统佛教建筑所建造的。寺之正殿供奉一尊大佛，另有一座七层佛塔，塔的每一层都供奉着一尊佛陀的雕像，此外还有日本曹洞宗寺庙捐赠的钟楼。主塔后的三层灵骨塔则存放骨灰坛和牌位。

胡志明市的堤岸区（Cho Lon）是中国城，有一座十七世纪末期建造的伽蓝

寺（Chua Giac Lam），是西贡最古老的建筑，也是一座祖传的寺庙，主殿内供奉着一尊尊雕工精美的镀金佛像，其他如判官、阎王与观音等神祇。位于胡志明市中心北方的麦提路（Mai Thi Luu），有一座中西合璧的玉皇庙（Phuoc Hai Tu），是在西元 1909 年由中国佛教徒所建造的，是胡志明市色彩最鲜艳的寺庙。庙内供奉着主神玉皇大帝，右边则是十八支手的准提佛母。胡志明市东南约 128 公里的半岛海滨头顿（Vung Tau）的中滩山坡上有一座卧佛寺（Niet Ban Tinh Xa），内有水泥塑成十二公尺长的卧佛，卧佛脚底刻着佛陀的事迹。

位于越南中部的顺化（Hueh）原为占婆王国所属的乌里州，直到元成宗大德十年（西元 1306 年），占、越联姻关系才并入越南的版图。而从西元 1802-1945 年间一直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王都，目前大内皇城以及嗣德皇帝、启定皇定、明命皇帝、绍治、嘉隆的皇陵，都是值得一看的古迹。

而第一位统治顺化的阮璜（Nguyen Hoang）于西元 1601 年建立了天姥寺（Thien Mu Pagoda, Chua Thien Mu），据说天姥寺的位置是龙脉之首，不仅地理风水好，而且风景视野最佳。天姥寺的入口台阶就设在香江河畔的山坡上，寺院正前有一座八角形的七层慈悲塔，高 21.24 公尺，是以运自占婆的砖头所建造，“高塔映江”是本寺的美景之一。

据说此塔曾造七尊佛像于其中，是分别代表佛陀的七种不同化身，塔内有一尊镀金的笑佛，及三尊细致优美的佛像，塔外有六尊守护神塑像捍卫着。天姥寺的主殿大雄宝殿建在花园内，里面第一间佛堂有一尊铜铸的弥勒菩萨像，殿后还有官（关）武祠（Quan Vo）与官（观）音寺（Quan Am）。

此外，有一块大理石龟驮着的石碑，上面刻记着天姥寺宣扬越南佛教的贡献。顺化的寺庙建筑大多与自然环境配合，常建在树林茂密的山丘上，或建于水流缓和的江岸边。建筑物上贴有金箔，或镶嵌贝壳和陶瓷，盖瓦、利用珐琅等技术，比较起来色彩丰富，更有求奇的特点。

北部的河内（Hanoi）古称升龙（Thang Long），是现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也是北越最大的城市，东西文化兼具，城内有许多带着与中国样式很相似的传统建筑，还零落的散立了早期法国式的建筑。市北红河旁有一湖，湖边种满桃树，此湖叫西湖（Ho Tay, West Lake, Lake of Mists 古称“迷蒙湖”），在其码头附近的小半岛上，有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西元 545 年），越南反抗中国人统治的民族英雄李贲（Ly Bon，可能是汉化的越南人）所建的古刹开国寺塔（Khai Quoc Pagoda），是十七世纪迁到现址的，并改名为卫国寺（Tran Quoc Pagoda，也称“镇国寺”）。卫国寺是越南历史最悠久的寺塔之一，塔里有一座西元 1639 年，明崇祯十二年时竖立的石碑，记述着卫国寺悠久的历史。

「李朝」圣宗时期建筑的寺庙通常是正方形布局，保存至今的有东京湾（Gulf of Tonkin）岸海港海防（Hai Phong）的祥隘寺，高九层；安子山华安寺（在今广宁省境内，越南最著名的古寺）；在河内有香海寺、招禅寺、石婆寺、独柱寺（又名“一柱庙”，建于莲花池中。）等。「李朝」的建筑风格都与中国同类建筑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越南民族的特点。越南的传统建筑，人民的长相较黑瘦外，其生活的习惯，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总令人有一股说不出的感伤，好像久远不曾见面的兄弟。

○台湾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汉传佛教徒聚会修行的地方—斋戒场所，今天在台湾（Taiwan）有以下不同的名称如：寺（Buddhist temple）、禅寺（Ch`an temple）、禅堂（Meditation-hall）、精舍（a pure abode）、莲社（The White Lotus sect）、堂（court）、佛堂（Buddhist court）、庵（A thatched hut, shelter, a small temple）、兰若（Aranya, forest）、道场（platform）、讲堂（The preaching hall, lecture hall）、法院、禅苑（Ch`an park）、行苑、竹苑（bamboo park）、岩（cliff）、阁（A pavilion, chamber, council）。

《台湾通史》指出郑成功之嗣子郑经「以承天府（今台南市）之内，尚无丛林，建弥陀寺于东安坊，延僧主之。」是有书记载台湾建佛寺之始。因为大陆移民潮的传入，属于“斋教”信仰的在家佛教流行于台湾。早期台湾寺庙建筑是继承中国南方的建筑传统，几乎是以寺庙作为部落的文化、经济中心。采用闽南的建寺方式，以中轴线布局兴建。所以，台湾的佛教建筑早期以中国南系的闽南建筑式样为多，被称为“南方庙”，装饰比较华丽，用色浓烈，对比鲜明，常见雕龙石柱及描绘或雕刻有民间忠孝节义的故事，是随着闽、粤移民的宗教信仰传入台湾。

清光绪二十一年（西元 1895 年），台湾、澎湖被日军占领以后，日系佛教建筑也引进台湾。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建筑就有了三大系统：闽南传统式、日本东洋风式和西洋欧风式。光复后，纯佛教的“北方庙”是随着大陆新移民传过来的，其北方宫殿式的外观，则较为简洁、淳厚。目前台湾所管辖的领土有 36, 179 平方公里，人口有 2, 200-2, 300 万人。

闽南传统式建筑是以主殿中轴为中心形成的三或四合院型制的寺庙群，可是重视木、石雕的精细表现，与中国北系建筑的重视彩绘比起来，显然还更花俏许

多。其刻意追求细部繁复的雕琢，几乎到了无处不施雕、无处不上彩的地步。重建前的艋舺龙山寺前殿采用“单檐三川式”脊，正殿则采用一条龙式屋脊，缓缓的弧线两端燕尾起翘，脊上有龙凤抢珠、人物、花草装饰。前后殿之间以高墙回廊连结，采纵向扩建方式修建。

日本东洋风建筑样式比较厚重，屋脊、垂脊均为平直，脊上无饰物，以黑瓦取代琉璃瓦，以歇山面向前，或为“唐博风”的正面。已拆除的善导寺原来的大殿就是一例，不知是海岛气候潮湿，或系属日本遗风，这种建筑自从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由于仇日的心态导向下，并未鼓励维修，任其颓败，至今几乎已难再见。

也是在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西洋欧风式建筑，以后里的毗卢禅寺、观音山的凌云禅寺为代表，采用钢筋水泥建材配砖砌墙修建。日据时代的日本崇仰欧风的心态很重，现今的总统府就是最大的欧风建筑。所以，在西元 1927 年，昭和二年建筑的毗卢禅寺就见不到东方建筑的语汇，主殿前的五根圆柱柱头是希腊“爱奥尼亚柱式”（Ionic order）的装饰，为云状卷涡，但柱身无凹槽；凌云禅寺的旧法堂是二层的砖石砌造建筑，正面有西洋式山墙、回栏，方柱头是希腊“多利克柱式”（Doric order）的装饰，但柱身无凹槽，为样式厚重的圆柱；台中宝觉寺大殿回廊前之石柱下方上圆，柱头是希腊“哥林多柱式”（Corinthian order）的装饰，以棕榈叶状做成，看来简洁典雅。其实，古犍陀罗地区的佛教建筑就是希腊建筑，仿佛时空又回到二千年前当时。

根据江灿腾博士的研究调查，台湾佛教迟至日据时代才有「大法脉」的出现，「大法脉」是指佛教道场在佛法传承上，有法脉的源流和继承，同时也扩展根本道场之外的外围道场或布教区域。目前的台湾佛教有四大法脉包括：基隆月眉山的灵泉禅寺派；台北观音山的凌云禅寺派；苗栗大湖法云禅寺派；高雄大岗山的超峰寺派。

大岗山法派的核心寺是超峰寺，为清朝乾隆年间的台湾知府蒋允焄所创建，初期并无大发展，直至日据时代以后，来自台南的僧侣周义敏林永定师徒，才将超峰寺经营成大岗山法派的大本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部以大岗山为军事要塞管制区，以超峰寺容易成为美军轰炸判读的目标为由，迫令大岗山僧尼下山。林永定门徒陈永达因此率僧尼，在山下另建新超峰寺。

大岗山法派在历经近百年的发展，衍生出法智法师的旧超峰寺、能学法师的新超峰寺、梁开吉的莲峰寺、开会法师的龙湖庵、开证法师系的宏法寺与义永寺、永隆法师系的高雄内惟龙泉寺、圆宗法师的田寮日月禅寺、开通法师的嘉义德源禅寺、圆融法师的屏东东山禅寺及天乙法师、心淳法师系的兴隆净寺。

台北市忠孝东路上，离火车站十分钟路程的善导寺，建于民国十四年。中国佛教会也设立在此。近年新建的九层高慈恩大楼，就已经不是传统式的佛殿，像一座中国式的办公大楼。今年又将日式建筑样式的大雄宝殿拆除，另新建中。

万华艋舺龙山寺，是二百多年前，有船夫挂遗一个“龙山寺观音佛祖”的香火袋在当地，因显出磷火般的火光，受到奉祀灵验后，参拜的人逐渐增多，最后才兴建庙宇的。

介绍台湾地区的寺庙建筑很多，此栏仅约略提及她的特点，希望读者另行参阅其它相关书籍。

台湾佛教早期以「佛道一寺」居多

台湾在日据时代，受到日本人对神道与佛道不分的影响，也产生神佛共祀的寺庙。也曾经因为日本采取“皇民化”的政策，所以聪明的台民便将含有民族信仰的神祇供入佛寺。日本政府对殖民地的宗教政策，采取伪装宗教自由期、笼络台湾信仰期、逐渐消灭期。是故为了保存民间信仰，台湾佛教以「佛道一寺」居多。

中国民间之所以接受神佛共祀的原因，源自宋徽宗宣和元年（西元 1119 年），岁次己亥，徽宗赵杰受道士林灵素所惑，以不废佛教，则为中国礼义之害，乃改佛刹为宫观，称佛为「大觉金仙」，使着天尊之服，连带也使宋之译经院消失，并改称菩萨为「大士」、罗汉为「尊者」、和尚为「德」。又新立一「仙佛合宗」，后来造成佛、道（Daoism）不分，佛教成为民俗信仰，华丽而庸俗。

宋朝以后，中国伦常礼教的观念日益加深，在信佛的闺女房里供奉一尊男性的菩萨，是十分不妥当的，女性观音自然成了妇女虔诚供奉的菩萨像了。台湾的寺庙大都是妇女在初一、十五去烧香祈求平安的地方，供奉有现女性身的观世音菩萨，就不觉稀奇了。但是称呼为观世音大士。这是受到宋朝佛道不分的影响。而且以“妈”的昵称称呼观世音菩萨为“观音妈”（Guanyin Ma），将菩萨与林默娘成道后被帝王封的天上圣母——“妈祖婆”同视。妈祖婆的信仰是因为施琅攻打澎湖，受到妈祖的护佑，清朝对妈祖大加封赐。台湾热烈信仰妈祖的风俗，应归功于满清政府的鼓励。

「佛道一寺」的南华普门寺的启用

西元 2000 年 9 月 6 日，位于台湾花莲县的南华普门寺，在建造近六年后，

以新兴完成东台湾最硕大的庙门，举行隆重的「开庙门」仪式，并接受各方善信的朝拜。台湾的佛道寺庙建筑，常因经费不足，只要主体建筑与庙门安装完成，便以传统「开庙门」仪式，昭告天下开始启用。如此善信的捐助也比较能够凝聚。

台湾的寺庙不管佛道两教，都开有「三川」门，中门通常都不开启，只有重大节庆或有高官莅临，寺庙才会敞开中门，平时都开左右两门供进出。台湾传统道教的寺庙中门门神，常是唐太宗的大将秦琼与尉迟恭，以象征忠勇的历史人物为守门神。南华普门寺供奉的主神就是观世音大士，大门门神则请哼、哈两将守门，有别于传统道教。绿脸的哼将军抿着嘴唇，象征超脱人世，以冷眼看人间；红脸的哈将军虽看破俗事，但仍能笑颜以对。普门寺的左右两侧门，则以持利剑的「风」将军、斜抱琴器的「调」将军、持伞的「雨」将军、捧龙的「顺」将军四大护法守护，祈福人间风调雨顺。

开庙门的仪式有请煞、洁净的施法诵经，一一驱赶潜藏在寺中的鬼邪。而最重要的是安奉龙神，以迎接象征祥瑞的龙神，同时驱除白虎星防止它在庙里作怪。最后由主持道士亲绘「九宫八卦」图符交与庙方，作为镇庙之用。

○小结

“像法”是各国大师们造成的，大师如果都说“正法”，“像法”就不会来临，也不会存在。自古以来帝王都把宗教视为教化人民成为“愚民”、“顺民”的工具，强力的加以干涉，不希望民众太聪明，只希望国民都是“顺民”，同时让每一个人都追求往生，就无暇质疑施政的无能，也可以用来模糊政绩的错败。佛教的理念太有智慧了，帝王当然会对禅宗等派别加以限制，似乎早期台湾的佛教也有如此的倾向。